

保守與突破—— 漢娜·莫爾的個人事業與十八世紀 英國社會

汪采燁*

漢娜·莫爾(Hannah More, 1745-1833)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相當有影響力的英國教育家、福音主義社會改革者、保守思想的宣傳者。莫爾在政治體制和社會階級上堅持保守立場，強調傳統秩序，但同時，她也積極參與社會改革，並取得顯著成就。她的思想上具有矛盾性和緊張性，一方面她不接受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契約觀，但認可洛克論理性和教育；另一方面，她遵從既有政治秩序和父權體制，卻又強調女性的社會角色與成就，並實踐基督教的慈善理想。這些正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社會的特色，宗教、文化、政治、經濟和技術都出現前所未有的變革、衝突和混亂，思想和訊息的傳達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因此，本文將莫爾置於這樣充滿動盪的時代背景中，探討她的寫作目的，及其實現社會改革的方式。本文的重點不在於她如何強化舊有規範與道德價值，而在於她如何靈活運用文化和社會資源，為女性提供理性的教育和更高的行動力，並開創出一番社會改革事業。

本文藉由審視莫爾的作品與行動，指出她的思想與實踐根源於英格蘭國教會信仰與福音主義，並以此推動整體社會的改善和道德秩序重整。雖然她批評商業社會帶來的私慾和世俗化，但恰恰是商業社會的橫向連結網絡、開放性與自由性，促成了她事業的成功。本文第一部分勾勒莫爾的思想，特別是她對女性教育和社會角色的看法，強調她雖主張保守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但並非專制王權和父權的捍衛者。第二部分以三小節探討莫爾與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道德重整運動的關係，及她如何將基督教的自由和反奴役理念貫徹在現實社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會，推動道德教育，促進世俗福祉。第三部分則從莫爾的社會網絡切入，分析她在遵循既有秩序的同時，仍能展現個人主動性；尤其在皈依福音派後，她積極利用社會和文化資源，通過文人聚會和書籍傳播，推動社會改革思想，體現其私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模糊性和互融性。在革命年代，莫爾這位保守女性既抵制商業社會和民主革命，卻又對社會改革做出極大貢獻。

關鍵詞：漢娜·莫爾、福音主義、社會改革、公共領域、論冊、道德重整

一、緒論

漢娜·莫爾(Hannah More, 1745-1833)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相當有影響力的英國教育家、福音主義社會改革者、保守思想的宣傳者。她壽命之長，讓她見證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工商業社會的快速發展與變革，並經歷了廢奴運動、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拿破崙戰爭時代的國家敵我意識，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改革和群眾運動。她在政治體制和社會階級方面始終採取保守立場，強調傳統秩序；然而，她也熱衷參與社會改革，不論在女性教育、廢奴運動還是福音傳播方面，皆取得顯著成就。可以說，莫爾一方面遵守社會階級秩序，致力強化國家和宗教意識；另一方面也積極行動，為中下層階級創造了受教育並貢獻社會的機會。這些作為導致她被戰後左派歷史學者、文化批評者和女權主義者批評，認為她的高成就強化了父權社會的權力結構，穩固上下階級各司其職的社會秩序。然而，反對法國大革命、強調菁英領導，就必然是反對社會進步嗎？女性主義研究中，例如卡瓦勒斯基—華樂思(Elizabeth Kowaleski-Wallace)將莫爾定義為「爸寶」(daddy's girl)，急於得到父權社會的認可，開啟 1980 年代後二十年間美國學界對於福音派和莫爾持續的批判。¹直到近十年來福音運動的研究，轉向注意到十九世紀福音教派在社會改革上的現代性和機動性。²此外，1990 年代的十八世紀公共領域研究開始注意到公

¹ Elizabeth Kowaleski-Wallace, "Milton's Daughters: The Educ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Women Writers," *Feminist Studies* 12:2 (Summer 1986): 276.

² 參考 Joseph Stubenrauch, *The Evangelical Age of Ingenuity in Industrial Britai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Gareth Atkins, *Converting Britain: Evangelicals and British Public Life, 1770-1840* (Woodbridge-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2019).

私領域間的模糊性，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角色，使得關於莫爾的研究也出現不同觀點。凱瑟琳·薩瑟蘭(Kathryn Sutherland)率先論道，莫爾的作為，乃是將女性置於家庭和國家改革的核心位置；³哈麗特·蓋斯特(Harriet Guest)，安·梅洛(Anne K. Mellor)，安·斯托得(Anne Stott)等文學評論學者的研究，則主張莫爾展現的是「保守的女性主義」(conservative feminism)，她提倡各身分和階級的人皆有其職責，並推動更為理性、道德的中產階級女子教育，擴大了女性自我實踐的可能性。⁴

英文世界對於莫爾身處的保守陣營或福音教派研究相當豐富，在將近一個世紀的研究中，莫爾的形象多次轉變，有時被視為協助父權社會的壓迫者，反對改革，甚至是順應父權體制的匕首。近年來她則被重新詮釋為具有原型女性主義色彩的作家，或作為道德教育家，積極推動女性教育改革。筆者同意漢娜·莫爾思想上的矛盾性和緊張性，例如一方面她不接受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契約觀，但認可洛克論理性和教育；另一方面，她遵從既有政治秩序和父權體制，卻又強調女性的社會角色與成就，並實踐基督教的慈善理想。這些正是十八世

³ Kathryn Sutherland, "Hannah More's Counter-Revolutionary Feminism," in *Revolution in Writing: British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Kelvin Everest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63.

⁴ Harriet Guest, "Hannah More and Conservative Feminism," in *British Women's Writing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Authorship, Politics and History*, ed. Jennie Batchelor and Cora Kaplan (New Yor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58-170; Anne Stott, "Patriotism and Providence: The Politics of Hannah More," in *Women in British Politics, 1760-1880: The Power of the Petticoat*, ed. Kathryn Gleadle and Sarah Richards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39-55; Anne Mellor, *Mothers of the Nation: Women's Political Writing in England, 1780-183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ne Mellor, "Review: Feminist Debates in the 1790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3:4(2004): 519-524.

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社會的特色，宗教、文化、政治、經濟和技術都出現前所未有的變革、衝突和混亂，思想和訊息的傳遞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因此，本文將莫爾置於這樣充滿動盪的時代背景中，探討她的寫作目的，及其實踐社會改革的方式。筆者認為，過分關注國家「權力」與「社會控制」，恐錯將莫爾放在反對社會改革的位置上論述；同樣的，過分強調女性主義議題，也可能低估莫爾的主動性和行動力，又或者提高了莫爾沒有關注的「女性主義」，高估她在性別議題上的洞見。莫爾不談政治思想或個人權利，不具備現代的性別或女權意識，與其爭論或批評她是／不是原型女性主義者，有意或無意提升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度，本文更想強調的是什麼樣的內在和外條件，讓無論被視為保守或注重社會改革的莫爾吸引其贊助者，逐漸累積社會資本，形成社會影響力。

因此，本文的重點不在於她如何強化舊有規範與道德價值，而在於她如何靈活運用文化和社會資源，為女性提供理性的教育和更高的行動力，並開創出一番社會改革事業。本文透過審視莫爾的作品與行動，各類寫作、書信內容以及所處的歷史脈絡，揭示其思想與行動根基於英格蘭國教信仰和福音主義，旨在促進社會整體的改善與道德秩序的重建。莫爾透過作品和廣泛的人際網絡，塑造出具有行動力的基督教女性愛國情操，有別於激進共和主義者批判政府的政治行動。雖然她批評商業社會帶來的私慾與世俗化，但正是商業社會的橫向連結網絡和自由性成就了她的事業。本文第一部分概述莫爾關於女性教育及其社會角色的思想，指出儘管她強調保守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但她並非專制王權與父權的捍衛者，「家」和「花園」反而成為女性參與公共生活的橋樑。第二部分探討她與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道德重整運動間的關係，及其在推廣基督教自由與反奴思想，促進世俗社會福祉的努力。此外，莫爾後半生的行動展現出懲罰式神意論的特質，深信

個人的德性和慈善作為能促進公共之善。第三部分則著眼於她的人際網絡，分析她在遵從既有秩序的同時，如何展現個人主動性。自皈依福音派後，她更加積極地運用社會和文化資源，透過文人聚會，書籍出版和社交活動傳播改革思想，展現其思想與行動中私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模糊性和互融性。在革命年代，莫爾這位保守女性既抵制商業社會和民主革命，卻又對社會改革做出極大貢獻。

二、研究回顧

安·梅洛在《國家的母親》(*Mothers of the Nation*)指出，二戰後研究英國十八、十九世紀最為著名的史家多為左派立場，如 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 嚴厲批評莫爾以及福音教派「促成土地鄉紳恐懼社會改革」，以至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人道主義蕩然無存，而莫爾的慈善事業和主日學校，也成為規訓資產階級，使之服從英國政治秩序的工具。而後受到湯普森影響的學者，持續視莫爾的事業為社會控制，是父權社會的壓迫性計畫，是反社會改革、反女性主義、反啟蒙。⁵

在二十世紀以降的研究成果中，正因為莫爾是保守政治和福音教派的積極宣傳者，後殖民或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她持守基督教倫理，並以之教導中下層階級，勸導民眾服從於階級社會下的父權結構。莫伊拉·佛格森(Moira Ferguson)指出，莫爾的著作始終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並迎合政治現狀。⁶凱瑞·西納南(Kerry Sinanan)認為，莫爾針對中下層階級的道德教育，有助於社會控制，強化固有的社會階級。⁷艾倫·

⁵ Mellor, *Mothers of the Nation*, 14-18.

⁶ Moira Ferguson,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an Emerging Abolitionist Discours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3:1 (1992): 3-4.

⁷ Kerry Sinanan, "Too Good to be True? Hannah More, Authenticity, Sincerity

理查森(Alan Richardson)視莫爾的教育事業為反女性主義，強化傳統父權結構，無意改變女性社會角色。⁸卡瓦勒斯基—華樂思批評，莫爾之輩的女性文人，在十八世紀家父長制教育(即使是慈善父權 benevolent patriarchy)下逐漸成熟的智識環境，「沒有選擇或行動的自由」。換言之，在此教育下，女兒們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主體性，甚至因為她們既想發揮長才，又不敢展現自我特色，而導致長期頭痛等心理影響到生理的病症。華樂思引用美國女性主義先驅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 1920-2013)之言論道，這些女性從未走出「生來就注定的邊緣地位、被束縛在毫無意義的過去、由他人決定的未來所限制的世界」。換言之，女性文人不具備性別意識，就無法自我定義，也無法決定要以何種價值而活。⁹

本文避免以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的女性主義理論來判斷歷史人物，並不試圖以現代標準來衡量她是否活出自我價值。每個時代都有其局限和開展，十八世紀的女性也不例外。換言之，若我們認為當代人所推動的改革有其意義，那麼歷史上女性的行動和成就也應被視為具有主體性和價值，而非因其局限而遭否定。因此，儘管現代的文化批評已對莫爾的作品產生了許多研究成果，本文將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著眼於莫爾如何利用啟蒙社會和基督教文化，通過當時的文化載體和傳播方式，為女性創造出更多教育機會，並促進她們從事社會改革的可能性。這部分得益於她的保守立場與社交能力，並且她善於運用出版物來爭取輿論支持，而這也反映了她所處的商業社會提供了文化和社會資源。儘管她批評商業社會，但她自身的事業正是得

and Evangelical Abolitionism,” in *Romanticism,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ed. Tim Milnes and Kerry Sinan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37-161.

⁸ Alan Richardson,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Romanticism: Reading as Social Practice, 1780-18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⁹ Kowaleski-Wallace, “Milton’s Daughters,” 289-290.

利於英國商業社會的典範。

有關英國近代工商業社會、大眾文化和出版與閱讀發展的研究成果相當多，在此不贅述。¹⁰特別要提出的是，研究英國近代大眾文化出版品及其傳播的學者約瑟夫·斯特本勞赫(Joseph Stubenrauch)指出，福音教派在英國進入現代化和工商業社會之際佔了關鍵角色，「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福音教派既提供了變化的動力，也提供理解和回應變化的方式」。¹¹斯特本勞赫不僅看到福音教派規範社會秩序的面向，也注意到福音教派吸引了大批學者菁英，形成眾多社群團體，運用社會資源積極行動，改造並打造他們理想的基督教社會。¹²他整合了過

¹⁰ 關於工商業社會、消費社會和奢侈文化，參考 Maxine Berg,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aul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9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關於此時期的閱讀文化，參考 William St. Clair,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¹¹ Stubenrauch, *The Evangelical Age*, 15.

¹² 二戰後英美世界對於福音教派的研究，也受到左派思想影響，傾向批評福音教派正當化中產階級理想和道德觀，強化維多利亞社會的父權、分隔領域(男主外女主內)和對於女性和窮人的規範。直到 1980 年代後文化史或宗教史學者提出修正，近年來則著重帝國主義與福音傳教活動研究，關注不同種族、信仰、性別之間的文化接觸和碰撞。本文參考的福音教派研究著重在福音教派與啟蒙文化結合，對於十八和十九世紀初英國公眾文化的影響：David Bebbington,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貝賓頓研究近代英國社會變化如何影響福音教派發展，以及福音教派活動如何被英國社會接受，進而改變英國文化。也參考 Stubenrauch, *The Evangelical Age* 和 Atkins, *Converting Britain*。阿特金斯研究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福音教派如何影響英國政治文化和市民生活。

往對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商業社會與大眾文化的研究、福音教派活動研究，以及十九世紀作為改革時代的主題，換句話說，「大眾市場在十九世紀轉成為一種『救贖的手段』」。13本文的主角莫爾不是斯特本勞赫書中的要角，不過斯特本勞赫所論述的時代特性，恰恰是莫爾生活的時代。莫爾在面對無論政治、工商業社會、宗教信仰、社會倫理道德發展都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福音教派基督信仰成為她徬徨或行動時的思想框架，也提供了實質上的物質資源和社會網絡。

在女性議題上，莫爾時代的英國已經出現主張男女教育平等和女性自主權的論述。它們雖是小眾意見，聲量卻相當大，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是最好的代表。也因此，這兩位高社會成就的女性文人往往被後世研究者相互對照：從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中，吾人看到原型女性主義的濫觴，而莫爾的著作則反映出大西洋政治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的轉折中，保守派捍衛傳統秩序的態度，並且反對法國式的政治革命。早在1970年代，文學批評家米茨·邁爾(Mitzi Myer, 1939-2001)曾指出，莫爾支持理性教育，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女性教育論點有相似之處。14直到二十世紀末，梅洛方延續邁爾的研究，關注莫爾對於英國社會的貢獻，帶起英美學界對於保守女性在公共領域貢獻的研究興趣，愈發將莫爾放在具備現代女性意識這一頭來論述。15筆者認

13 Stubenrauch, *The Evangelical Age*, 101.

14 Mitzi Myer, "Reform or Ruin: 'A Revolution in Female Manners'," in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ed. Deidre Shauna Lynch,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319-335.

15 梅洛的研究著重在十八世紀末至維多利亞時代女性文人的作品、出版和公共影響性。參考 Mellor, *Mothers of the Nation*. 近年來為莫爾作傳的作家也不再僅將莫爾視為反動思想家，如斯托得指出，莫爾是「重要事件中的關

為，邁爾和梅洛都強調莫爾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女性教育的相似態度，卻都沒有清楚指出兩人之所以相像，是因為十八世紀的英國基本上擁抱了洛克的教育觀。然而，兩人的「自由」概念根本不同：沃斯通克拉夫特抱持共和主義，強調公民權利和政治參與，希望社會中不再有任何奴役和依賴。莫爾的福音主義則是希望所有人了解並接受自己在階級社會中的地位，此乃神意安排，不應該逾越本份，在這樣的條件下，每人各司其職，各盡其力。此外，她認為在上位者應當利用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資源，服務國家社會。

目前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思想的著作，大部分並未忽視莫爾的貢獻。比較可惜的是，在當中她往往被視為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的追隨者，以及政治政策的宣傳者，沒有特別著墨莫爾個人作為的獨特性。本文更想將鎂光燈聚焦在莫爾身上，嘗試以這位女性為中心，再現她與她的社會互動勾勒出的樣貌。不可否認，莫爾在教會和國家體制方面的態度與柏克相似，皆主張國教會、君主憲政、階級社會是英國文明的重要基礎。然而，兩人宗教信仰上的差異，導致他們在思想實踐上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莫爾身為福音教派的信徒，強調聖經教育、道德感化和社會實踐；柏克重視的則是教會對於社會秩序的維繫。因此，在對於貴族和下層階級的道德風俗問題上，即使莫爾主張由菁英階級推動國家道德改善，她仍時常批評貴族的奢侈行為缺乏理性和節制，是造成十八世紀英國社會腐敗和帝國轉衰的主因。¹⁶

鍵人物」，「在支持現有等級社會的同時，致力於變革」。Anne Stott, *Hannah More: The First Victor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xi. 也可以參考 Harriet Guest, "Hannah More and Conservative Feminism," 158-170.

¹⁶ 參考 Hannah More,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6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1-89 和 *Estimate of the Religion of the Fashionable World*,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6, 91-267.

莫爾不像柏克一樣謳歌騎士精神，她的信仰驅使她更重視如何實踐基督教道德。其次，莫爾看到下層階級的無知和懶散，主張提供下層民眾教育，並相信女性只要接受了理性教育，也能夠發展思考能力。柏克是國會議員，他對於中下層人民的教育沒有興趣。兩人不同的信仰和身分，導致他們不同的寫作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代出現幾部重要的文化史研究，對於女性在十八世紀消費社會和印刷文化中的角色做出精彩的分析，並回應了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的概念，批評他忽視了婦女在公共領域和私領域中所受到的限制。¹⁷到了 1990 年代，歷史學家從家庭、政治活動、社交生活等新視角，考察婦女在公共領域中的角色與作用。無論是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琳達·科利(Linda Colley)，阿曼達·維克里(Amanda Vickery)，安·斯托得和哈麗特·蓋斯特等人的研究成果中，皆可以看到公共領域和私領域之間的流動性和複雜性，這兩個領域不一定是對立或分隔。而本文將呈現的莫爾的社交聚會和書信世界，也正揭示了私人場域的公共特質。¹⁸不過，本文想

¹⁷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T. Burg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¹⁸ Lawrence E. Klein, "Gender and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Questions about Evidence and Analytic Procedu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 (1995): 97-109; Amanda Vickery, *The Gentleman's Daughter: Women's Lives in Georgia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manda Vickery, "Golden Age to Separate Sphere? A Review of the Categories and Chronology of English Women's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6:2 (1993): 383-414; Anne Stott, "Patriotism and Providence," 39-55; Harriet Guest, *Small Change: Women, Learning, Patriotism, 1750-181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進一步強調的不是公私領域的議題，或她是否有意利用私領域模糊性的特性來達成自己的公共理念，而是生在這個時代，莫爾擅長運用不同方式，掌握公共領域的社會資源與人脈，帶動輿論風向，這正是她成功發揮社會影響力的主因。

另一個要指出的特點是，莫爾的公共領域和社會改革活動並不排斥政府機關和政治權力。正如歷史學家約瑟·哈里斯(Jose Harris)所言：「英國社會在許多世紀的演變中，充滿了大量蓬勃發展的『自發性』自治志願組織——宗教、商業、教育、慈善、科學、地方或特有的——它們的存在要麼是法律和政府機構完全不知情，要麼只受到極輕的監管。」¹⁹英國政府積極支持莫爾改革社會風俗和道德的事業，這也意味著莫爾的思想符合小威廉·彼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的政治宣傳所需。²⁰然而，我們不能簡化地說，莫爾傳道士般的事業是在政府計畫好或是受政府監管下的成果。她的事業、她所建立的公共領域和社交網路，既不與政府對立，也不排除政府的手伸入其中，是在個人亦步亦趨、隨著其社交範圍、視野擴大後逐漸展現自我長才，並在皈依福音教派後，更為積極行動，而得到輿論的肯定，方獲得教會與政府大力支持。²¹

¹⁹ Jose Harris, "Introductio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Paradigm or Peculiarity?"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ed. Jose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

²⁰ 小威廉·彼特在 1783 至 1801 年，1804 至 1806 年間擔任英國首相。

²¹ 關於英國市民社會和政府權力互動議題，參考 Jose Harris, "From Richard Hooker to Harold Laski: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Late Sixteenth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13-37.

三、女性內在與行動力

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在探討自由和理性的價值時，批評君主專制和專制父權，不過整體而言，他們仍受等級觀念影響。在性別或男女職責的想法上，洛克的「白板論」(tabula rasa)和「人皆有理性」對於十八世紀菁英社會影響很大，所以十八世紀英國教育書對於女性的態度上，出現更理性和自由的教育方式，不過許多層面仍舊承襲歐洲基督教社會的觀念，相信女性在身體結構、體力和心性上，最宜擔負與家庭相關的職務，不宜掌握社會權力或參與政治活動。啟蒙時代著名的教育書強調，男性應當(或被期待)堅強、獨立、理性，並活躍於公共領域，而女性則因為天性柔弱、依賴、情感豐富，適合以家庭為主要領域。²²大致而言，十八世紀英國社會鬆動了父權專制，然而，如羅伊·波特(Roy Porter, 1946-2002)在《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中所寫，十八世紀男性透過聖經、法律規範、政治權力等確保自身地位的優越，而女性則是被規範的角色。²³十八世紀教育書作者詹姆斯·佛戴斯(James Fordyce, 1720-1796)、約翰·格雷戈里(John Gregory, 1724-1773)和托馬斯·吉斯本(Thomas Gisborne, 1758-1846)身為啟蒙時代接受洛克教育理念的文人，他們都主張不應鼓勵女性參與公共活動，其教育書也就特別著重女性在家庭中的職責和婦德培養。²⁴

²² 十八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教育書，可參考 James Fordyce, *Sermons to Young Women*, 5th ed. (London: D. Payne, 1770); John Gregory, *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774); Thomas Gisborne, *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 (London: T. Cadell, 1797).

²³ Roy Porter, *Enlightenmen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2001), 320.

²⁴ 對於吉斯本來說，其他超出「家庭範疇」的職業和活動，如政治、政府管

莫爾基本上接受當時的性別觀念，上帝創造人類，賦予男女不同的生理特質和社會責任。就如她在女性教育書《對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799)中所寫，女性比男性更柔軟敏感，更具感受力(*sensibility*)，因此女性更適合成為照顧者。然而，莫爾對於女性的看法和前述撰寫教育書的男性作家有幾點不同，莫爾解釋女性的「中庸、謙遜、溫柔和理智」等特質時，認為女性同男性一樣具備理性和行動力。莫爾在早期詩歌〈感受力〉(“*Sensibility*”)中寫道：

甜蜜的感受力！你敏銳的快樂！

自發的道德！對於光的不尋常感知！

敏銳的知覺！德性的種子！

你！自由行動的快速先驅！²⁵

莫爾筆下的感受力是積極的，是梅洛指出的「對於他人痛苦的積極——而非被動——同情」。²⁶

莫爾視家庭為國家的縮影，²⁷個人的行為是「公共善的唯一堅實

理、商業等，都是屬於男性的職責，因為他認為女性缺乏「深刻和全面的推理能力，以及強烈和持續的應用能力」。²⁸ Gisborne, *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 20-21. 佛戴斯也主張，「戰爭、商業、政治、力量和技巧的運用、抽象哲學以及所有(晦澀的)科學最適合男性」。因此，他希望女性能夠了解自己的本質，並且留在主要適合她們的家庭範圍內。James Fordyce, *Sermons to Young Women*, 210-211.

²⁵ Hannah More, “Sensibility,”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A New Editio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179, line 237-240.

²⁶ Mellor, *Mothers of the Nation*, 28.

²⁷ 「家」作為「國」的政治縮影無論在近代保守到激進的政治思想中都可以見到。例如柏克所講的愛國情操就根植於家庭中，他的家庭感情強調忠誠服從的價值，而此美德也成為加強社會連結和秩序的紐帶。強調平等和共和主義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則不滿於強調服從的壓迫性家庭情感，這也正是

基礎」。²⁸換言之，私人的努力，力量再小也可以增進國家福祉；反之，個人對於家庭的忽視和行為不檢點，也會阻礙國家發展。²⁹因此，莫爾呼籲中上層婦女不僅在家庭中，還應該在孤兒院、醫院或主日學校等機構的慈善活動中，將她們的虔誠信仰和德性表現出來，積極投入社會服務。

莫爾也不是全盤接受社會現狀，她對於當時社會的風俗與女性教育都曾提出批評和改善之道。這反映出莫爾雖然批評激進啟蒙思想家，自身卻也浸淫在此時代精神之中。她主張女性也應該接受理性教育，並譴責當時的女性教育流於婚前技藝訓練，女性只專注於繪畫、歌唱和跳舞等技能，缺乏理性涵養。³⁰正如她在《對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開篇段落中所寫：「這樣奇特而不公正的待遇時常發生在女性身上，先給予她們極不完善的教育，然後又期望她們保持最純潔的行為。」³¹因此，她強調理性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培養德性和更為精緻的感性。

雖然在政治觀點上，莫爾不支持洛克的契約觀念，在教育上卻接受了洛克對於人性和教育的看法。洛克在《人類理解論》(*An Essay on*

歐洲和英國當前政治壓迫現象的根源。參考汪采燁，〈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反思——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思想研究〉，《新史學》，28:2(臺北，2017)，頁 138-139, 159-160。

²⁸ Hannah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3: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44.

²⁹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44.

³⁰ 在文學評論學者亞當·布里根(Adam Bridgen)最新的論文中，他強調莫爾以「理性」作為她的修辭策略。莫爾以理性作為有力的論證方式，倡導宗教情感和道德改革。Adam Bridgen, "Defending 'Reason's Rein': Rationalism as Persuasive Strategy in Hannah More's *Slavery: A Poem* (1788)," in *Hannah More in Context*, ed. Kerri Andrews and Sue Edney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50-67.

³¹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v.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中論及，人在出生時的心靈是一塊白板，每個人都是憑後天的感知去累積經驗和知識，並且，人是理性的動物，都有理性發展的潛能和未來趨向完美的可能性。莫爾直言，洛克是「此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過的最準確的思想家，和最公正的推論家」，她尤其推薦《人類理解論》這本簡短而有高度價值的教育書，³²因為如同牛頓找到了自然世界的萬有引力，洛克也指出了人類智識和觀念發展的自然法則。³³

洛克在《教育漫話》(*Some Thought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中持續發展此論點，主張人性都可以走向理性和德性。他拋棄了基督教的原罪說，認為人類不需要等待上帝的恩寵或以神助來改善個人的生活，而這正是教育的重要性。如同洛克理想的君主體制是堅強、穩固且寬容的父權體制，兼顧帝國權威和自然權利，洛克的父親也是溫和、慈愛但具備威嚴的家父長，要求子女具有理性、德性且順從。此書原初動機是寫給友人克拉克夫婦(Edward and Mary Clarke)之幼子的教育書，「並不完全適合女孩的教育；儘管(生理)性別的差異需要不同的對待方式，但這並不是困難的問題」。這段話意味男女孩的基本教育方式是一樣的，只有在面對一些明顯的性別差異時才有不同。³⁴洛克寫給克拉克太太的書信，更清楚說明他的教育理念基本上是男女通用的：「因此，我承認在你思想中關於真理、德性和順從方面，兩性並沒有差異，我認為最好不要對於[寫給兒子的文本]進行任何修改。」³⁵洛克的教育和人性

³² Hannah More, *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vol. 2, 2nd ed.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5), 198.

³³ More, *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vol. 2, 199.

³⁴ 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Boston: Gray & Bowen, 1830), 53.

³⁵ "Locke to Clarke," in John Locke, *The Education Writing of John Locke*, ed. James T. Axt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44.

觀，成為這個世紀受良好教育的文人的基本理念。以華樂思的話來說，洛克的教育方法只提供了男性權威傳承的體系，而接受這套家父長制家庭教育的女性文人，如莫爾、小說家伯妮(Frances Burney, 1752-1840)，³⁶也會承接這套既威嚴又理性的父權價值，進而對於自身女性價值感到困惑，甚至焦慮和緊張。³⁷不論莫爾的生理疾病是否如華樂思所言，是因性別焦慮而生，筆者想要說明的是，莫爾的教育觀乃至於君權觀都承襲了「慈善父權」的態度。

基於此，莫爾認為女性應該接受一系列「思想、原則、技能」訓練，使她們不只會跳舞和打牌，更能「思辨和反思、感受、判斷、論述和辨析」。唯有此，女性才能夠應用知識到各種場合，成為丈夫的好伴侶，協助丈夫的事業，增強他們的道德觀念，並且教育子女。³⁸莫爾更進一步主張，除非女性接受了類似男性的理性教育和思想上的培養，否則「我們沒有更公正的理由宣稱她們的理解力已經達到最完美的狀態」，³⁹並且，「男女之間理解力的差異程度這個問題將始終無解，就像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理解力程度問題一樣」。⁴⁰在論述和支持女性理性教育上，莫爾援引了十八世紀廢奴運動的論點，強調上帝造人，儘管皮相有所不同，內在並無差異。莫爾在 1805 年《塑造年輕公主性格的提示》(*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1805)中再次呼應了洛克的理念，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形塑人的性格。莫爾透過一系列教育課程，期待教育夏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of Wales, 1796-1817)，⁴¹

³⁶ 伯妮是十八世紀末英國暢銷小說家。

³⁷ Kowaleski-Wallace, "Milton's Daughters," 280-281.

³⁸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69.

³⁹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3.

⁴⁰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4.

⁴¹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王室不得人心，全國上下普遍期待夏洛特公主繼位為王，然而她在 1817 年因難產過世，比祖父喬治三世(George III,

成為具備道德責任的王儲，未來引領英國繼續度過工商業社會和法國大革命的世俗化考驗。

與莫爾同時期的作家瑪麗·貝莉(Mary Berry, 1763-1852)曾在私人信中寫道，她在同時閱讀了莫爾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驚訝於這兩位女性「在女性教育的所有重要觀點上，看法一致」。貝莉補充道：「倘若莫爾聽到這個說法，我敢說她會非常生氣。」⁴²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張激進政治改革，和男女生來具有相同的本質與天賦。因此在她看來，如果兩性能夠接受相同的理性教育，女性也能夠成為理性、真誠、獨立的人，在社會中有所作為，並和男性一樣受到重視。據貝莉的觀察，沃斯通克拉夫特和莫爾都強調女性的德性、謙遜、理性的智識和細緻的感受，並且認為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同樣重要。⁴³當然，貝莉知道這兩位作家在政治立場上有很大的差異，莫爾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分屬保守和自由派陣營，這意味著兩人在人性和人的社會角色與責任觀點上是不同的。然而這兩位作家都接受洛克的理性論，並主張只要接受理性教育，女性也能夠理性思考。也就是說，兩人的論點之所以相像，是因為他們都強調男女皆有理性。基於此，兩位女性作家皆指出，目前女性教育內容和方法需要革新。

1760-1820 在位)和父親喬治四世(George IV, 1820-1830 在位)還早離世。

⁴² Mary Berry, *Extracts of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year 1783 to 1852*, vol. 2, ed. Theresa Lewis (London: Longmans, 1865), 91.

⁴³ 邁爾寫道：「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為女權辯護》和莫爾的《對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這兩部政治立場兩極化的作品，表達的理想和計畫有出人意料之外地一致性……兩篇文本中的一致性遠不止於她們共同堅持以女性教育和風俗的徹底革新，作為社會道德重建的先決條件」。Myer, "Reform or Ruin: 'A Revolution in Female Manners'," 324-325.也參考 Anne Mellor,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the Women Writers of Wollstonecraft's da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y Wollstonecraft*, ed. Claudia L. Joh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7-148.

從教育觀點來看，莫爾反映出啟蒙時代的理性與進步觀，社會需要持續改革。莫爾的教育觀以洛克為基礎，實踐的方式和道德的框架則是福音主義。她認為，人不會天生具備德性，而「宗教教育最重要的秘方……在於訓練年輕人養成克制內心的習慣，……沒有這樣的道德克制——這是基督教德性的基本法則——人就算隨著本性時常做善事，也不可能永遠是善的」。⁴⁴ 她不僅接受啟蒙理性和福音主義，更急於將福音轉為教育方法，提升不同階級的道德內涵，以及社會責任感。正如莫爾在《尋妻的單身漢》(*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1809)寫道：「小心翼翼地培養最高天賦——我們的理性，那麼你就不會冒犯到我們的造物主」，⁴⁵ 恰好展現出啟蒙思想與福音教派的特色。

女性、男性皆有理性，但是兩性天性不同，社會職責也就不同。莫爾寫道：「她們思想中的天生結構中，以及她們被召喚去填補的相對位置，具有某種特別有利於宗教的依戀感和依賴感。她們可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對於不屬於她們力量的需求。基督教帶來額外的力量，幫助她們彌補內在的弱點，並提供唯一真正的平衡力量。」⁴⁶ 在莫爾看來，女性天性和社會角色使她們更親近宗教，基督教能為女性提供所需的力量。此外，男性受教育過程中往往接受大量古典教育，而女性由於較少接觸古典教育，受到異教思想的影響較少，因此在進行基督教研究時，她們的觀點往往更加純粹，更容易培養出純潔的信仰。⁴⁷ 莫爾也持續強調家庭生活對於女性道德培養的重要性，「人們不免為這樣的念頭感到退縮：嬌弱的年輕女子，外表秀麗，思想和舉止出眾，卻夜復一夜地在時尚的公共祭壇上祭獻，既是崇拜者也是犧牲品。然

⁴⁴ More, *The Religion of the Fashionable World*, 155-156.

⁴⁵ Hannah More,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vol. 1, 9th ed. (London, 1809), 297.

⁴⁶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5.

⁴⁷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5-206.

而，人們不禁會想像，她出現在家庭生活中那些溫馨動人的場景裡」，會更加動人。⁴⁸本文第四章第三節將論到莫爾批評女性被消費社會的時尚和物質享受所奴役。由此可見，莫爾主張的適性教育和發展，在女性部分是著重基督教道德和家庭美德；如此在道德危機的時代，她們才能將私人之善轉化為公共之善，為國家社會善盡責任。

莫爾的保守性表現在她不具備社會平等概念——她延續現行的社會等級和性別觀念，也不願意談論個人(無論男女)政治權利議題。⁴⁹她不僅拒絕閱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為女權辯護》，⁵⁰甚至對於女性既不能成為「女政治家」(female politicians)，也不能成為「女戰士」(female warriors)感到高興。在她看來，無論政治家或是戰士都是適合陽剛男性的角色，若女性從事此類活動則是不自然，或違反自然。⁵¹因此，莫爾承襲了傳統基督教以及十八世紀教育書中的性別觀點和兩性位階。學者凱倫·奧布蘭(Karen O'Brien)也提到，即使莫爾的教育計畫給予女性自我實踐的可能性和道德主體性，女性活動的中心還是以廣義的「家」為範圍。⁵²這一方面顯示出十八世紀公共領域快速地發展，另一方面卻也反映出此時代對於男／女、獨立／依附、政治領域／家領域的分隔不再穩定而感到焦慮。

⁴⁸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78.

⁴⁹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0.

⁵⁰ Hannah More, "To Horace Walpole", in *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Fourth Earl of Orford*, vol. 15, ed. Paget Toynbe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3), 337. 沃爾波(Horace Walpole, 1717-1797)寫給莫爾的信中，將沃斯通克拉夫特描述為「穿著裙子的土狼」(a hyena in petticoats)。莫爾回信給沃爾波，認為人們不該花時間閱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

⁵¹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4.

⁵² Karen O'Brien,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2-235.

凱瑟琳·格蘭德爾(Kathryn Gleadle)亦寫到，十八世紀末英國女性一方面可以和男性一樣積極參與公共空間的活動，唯不得介入任何具備公民意義的政治活動，這正是此時代女性身分的矛盾性。⁵³莫爾也是如此，在福音主義的感召下，她展現出社會改革的行動力，⁵⁴主張女性參與改革的主動性。正如她在《關於大人物的風俗對於普遍社會的重要性》(*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1788)中的主張：「行動是德性的生命，世界是行動的劇場」，⁵⁵每個人都是傳教士，積極參與各項改善生活、提升道德的社群，例如主日教育、廢除奴隸貿易、幫助窮人。莫爾強調女性教育的「實際用途」，能夠「規範她自身的心智，並服務他人」。⁵⁶她敦促女性成為積極的愛國者與社會風俗的改革者：

我呼籲她們……站出來，為……國家做貢獻，而不損及她們性別的細膩特質；我會呼籲她們……提升令人擔憂的公共道德，喚醒沈睡的宗教原則之精神。⁵⁷

因此，莫爾講的是每一類人在社會中的職責，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有責任拓展自身力量，發揮公共影響力。這個部分可說是她與當時女性教育書、禮儀書作者最不同之處。若沒有注意到這點的話，莫爾很容易被視為身為女性卻拿著父權權杖壓迫女性的文人。

⁵³ Kathryn Gleadle, “‘Opinions deliver’d in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Politics, and Gender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72.

⁵⁴ Anne Stott, “Evangelicalism and Enlightenment,” in *Educating the Child in Enlightenment Britain*, ed. Mary Hilton and Jill Shefrin (Aldershot: Ashgate, 2009), 42-45.

⁵⁵ Hannah More,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69.

⁵⁶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87.

⁵⁷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3.

二十世紀下半葉性別史家尤其批評《對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中這段文字：

女性本應該從她自家花園的略高處看世界，在那裡她對於家庭進行精確的考察，但她無法看到遠處的景，站在更高的(男)人才可以看得更遠。⁵⁸

此文清楚指出男女間的權力、社會角色和責任的分野。男性在外工作、作戰和征服，女性則是「較小的家庭領域的合法擁有者」，灌溉、培育她們的家。⁵⁹女性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優雅和精緻的行為舉止，但這些最好僅在有限的空間中展現。

莫爾確實不具備女權意識與現代的平等概念，但她認為不平等社會下的人們依舊有其感受力和行動力。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去探討在花園工作的深意——女性身為家中園丁，透過在花園工作，將家的職務延伸出去，恰恰是莫爾自身的寫照。她認為在既有社會秩序下，女性也能認真工作，並且指出女性應當如何參與社會改革。「照料我的花園賦予我工作、健康，和心靈上的滿足」，莫爾在 1787 年給約翰·紐頓(John Newton, 1725-1807)的信中如此描述她在布里斯托近郊住所的生活。⁶⁰1806 年的她身體狀況不佳，較少寫作，大部分時間都在花園中做園丁工作。⁶¹在 1824 年，她在巴利伍德(Barley Wood)回首二十多年來致力於慈善教育的地方——這塊原本貧瘠的土地：「二十四年前開始，我在家

⁵⁸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2.

⁵⁹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0.

⁶⁰ Hannah More, "More to John Newton," in Hannah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ed. William Roberts, 2nd ed. (London: Thames Ditton, 1839), 87-88.

⁶¹ Hannah More, "More to Mrs. E. M. Garrick," 1806, "Hannah More Papers," ADD MS 42511. F.9. 莫爾私人信中常提及她在花園工作，或是作為園丁。

園上面的貧瘠山坡種植樹木……我非常享受這份工作。」⁶²莫爾在小說《尋妻的單身漢》也一再將女性和花園做連結。小說一開始，男主角就稱他著迷於「彌爾頓的夏娃」(Milton's Eve)在伊甸園的純真性格。⁶³然而，他接著直指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不了解「多才多藝」(accomplished)對於當代女性的真意——夏娃應當和亞當一起學習，接受理性教育和增長智慧。⁶⁴由此開始，莫爾擴大了夏娃的職責：夏娃作為園丁和慈善家，賦予女性行動力和主動性。女性既是生育者，也是生產者。換言之，莫爾利用花園與園丁概念擴大家庭領域：若夏娃在創世紀時候失去了伊甸園，那麼現代女性應擔負教育或慈善事業，以贖罪之姿肩負基督教慈善角色，在道德改革上盡一分力。⁶⁵在小說的最後，主角們都「增加了德性，認識了天堂」，真正享受花園中的生活。⁶⁶此處也呼應了學者梅洛的論點，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私領域的德性，或是說與女性相關的德性，如倫理和道德教育，逐漸具社會影響力，甚至主導公共領域發展，而莫爾正是重要推手。⁶⁷

⁶² Hannah More, "More to Wilberforce," 25 December 1824,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vol.2 (London: John Murray, 1840), 490.

⁶³ More,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vol. 1, 1.

⁶⁴ More,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vol. 1, 9.

⁶⁵ 參考 Judith W. Page, "Reforming Honeysuckles: Hannah More's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an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Gardens," *Keats-Shelley Journal* 55 (January 2006): 111-136.

⁶⁶ More,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vol. 1, 401.

⁶⁷ Mellor, *Mothers of the Nation*, 11.

四、宗教理念與社會改革

(一) 自由、獨立與反對奴役

莫爾一生的社會改革概念都受到宗教觀的啟發。她在 1780 年代為廢奴運動寫詩，主張不論膚色，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擁有理性稟賦，都應該受到尊重。廢奴運動的推動，也影響了莫爾和她同世代人對於女性參與社會改革的態度。正如帝國史與性別史家克萊爾·米奇利(Clare Midgley)在《反奴運動中的婦女》(*Women Against Slavery*, 1992)曾結論到，廢奴運動不僅鼓勵了女性參與公共活動，也激發她們的自我意識，注意到婦女仰賴著男性家屬的專斷意志，有如奴隸依附主人，無法或不能獨立思考和行動，以及女性和男性相比之下，尚未被視為完整、獨立的公民。⁶⁸此外，女性透過廢奴運動發展出國會外的政治文化，在運動中形塑了她們對外在世界和自身的看法。⁶⁹對於莫爾而言，她的女性意識和性別意識，是她知道男女在社會職責上不同，以及她知道如何在父權社會下取得資源。在廢奴運動過程中，她始終以基督教道德著手，強調人皆有理性和自由，這些基本想法會在她的教育事業和著作中展現。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湯瑪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 1760-1846)，亨利·桑頓(Henry Thornton, 1760-1815)和扎卡

⁶⁸ Clare Midgley, *Women Against Slavery: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1870*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76.

⁶⁹ 廢奴運動不只為女權運動，它幾乎為所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的社會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包括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廢奴運動和後來的反動物實驗運動。

里·麥考利(Zachary Macaulay, 1768-1838)等「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成員領導了十八世紀末英國民間反奴運動，莫爾也參與其中，他們一行人也是 1780 年代第二波福音派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威伯福斯是「廢除奴隸貿易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重要成員，該會於 1787 年在國會內成立，於倡議廢奴上扮演關鍵角色。桑頓是銀行家、國會議員，也是福音教派廢奴運動的重要贊助者，擔任「廢除奴隸貿易委員會」中分發莫爾《廉價知識文集》(*The Cheap Repository Tracts*)的財務官。麥考利在 1790 年代擔任獅子山(Sierra Leone)的總督，也是「廢除奴隸貿易委員會」成員。他的宗教信仰與威伯福斯和莫爾一致，進而成為社會改革上理念也相同的夥伴。麥考利在 1802 年到 1816 年負責編輯《基督教觀察家》(*Christian Observer*)雜誌，莫爾的廢奴或社會改革文章也會在此雜誌上刊登，例如後文會提到的〈白奴貿易〉(“The White Slave Trade”)。

根據歷史學者大衛·貝賓頓(D. W. Bebbington)的說法，福音派運動的重要特色是「皈依主義」、「行動主義」、「聖經主義」和「十字架中心主義」。⁷⁰雖然我們無法得知莫爾何時轉為信仰福音派，可以確定的是她在 1787 年認識了克拉朋聯盟成員，此後她在諸多方面都展現出福音派的特色，如她視聖經為基督教信仰真正且唯一的基礎，也熱衷於通過聖經使他人皈依，並推動社會改革。威伯福斯曾指出，「真正基督徒在基本實踐上的特色」乃是了解自身之罪惡並懺悔，不接受其他主人，而後「真誠且毫無保留的將自己奉獻給上帝」，所以「普遍而言，宗教促進政治團體的世俗福祉」。⁷¹這也是為何克拉朋

⁷⁰ Bebbington,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2-17.

⁷¹ William Wilberforce,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14th ed.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20), 94, 230.

聯盟結合宗教與社群力量，致力「制止奴隸貿易和改善風俗」。⁷²莫爾也抱持相似的道德改革目標；在地方教育上，她比三十幾歲時更為積極，並且從教會人士與國會議員的人脈中獲得社會資源，加速宣傳品的傳播，以實踐道德進步的願景。儘管貝賓頓或是前述的學者斯特本勞赫並沒有放多少注意力在漢娜·莫爾身上，但如本文所述，莫爾以積極、實用、多樣的方式宣傳福音和推動社會改革，也願意與各界合作，這正是福音教派的特色。

1787年，威伯福斯邀請莫爾撰寫廢奴詩歌，由威伯福斯在國會中朗讀。在〈奴隸制度〉(“Slavery: A Poem”)這首詩中，莫爾譴責奴隸制度對人類造成的傷害，指出此制度對於黑人的壓迫，恰恰和英國宣稱的自由傳統產生巨大矛盾，以及奴隸貿易和基督教教義之間的衝突。詩中明白寫道，上帝以自由之光照亮了全世界和全人類，並沒有區分黑人和白人；自由是上帝賦予所有人的權利，不應被任何外部人為力量所阻礙。⁷³

莫爾詩中所講的自由，不同於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或沃斯通克拉夫特倡議的共和主義和人人握有政治權利的自由。莫爾對於自由的理解，是來自於耶穌基督救贖世人的信仰，她希望透過詩歌譴責奴隸貿易不人道，並喚醒英國人民的道德責任感。她相信無論白人還是黑人，都可以被全能上帝之光照耀，在基督信仰中獲得自由。莫爾為奴隸爭取「自由」的同時，不忘說明真假自由之別：暴民行為上不願受約束，不服從政權，這不是英國人需要的真自由。唯有恢復理性、

⁷²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38), 130, 149.

⁷³ Hannah More, “The Black Slave Trade (Original Title: “Slavery: A Poem”),”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1, line 1-10.

合法和講求和平的自由，英國才能重振榮光。詩歌寫道：

唯獨你，端莊的女神！我來為你做證，
 在微笑中受到規範，穿著得體；
 不是那群眾中放肆的惡魔，
 它的吼叫聲如此可怕，如此響亮，
 使和平震耳欲聾；兇猛是派系的工具；
 從而誕生了草率的煽動叛亂，和瘋狂的混亂；
 頑固的嘴，拒絕理性的管束，
 沒有力量可以去管理，也沒有方法去抑制，
 它的魔幻呼聲引誘狂的群眾，
 踐踏秩序，污辱法律。⁷⁴

所以，莫爾堅守的自由不是潘恩的民主代議和公民政治權利，當然也不是放肆恣意行動，或任意傳播煽動性言論。她一直從宗教立論，並積極改善社會弊病。

在〈奴隸制度〉中，莫爾明確區分了虛假的自由和真實的自由。這種區分在她 1790 年代針對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論述中同樣有所體現。⁷⁵理查·霍爾(Richard Hole)認為，漢娜·莫爾在 1788 年可以讚揚自由理念的崇高道德性，然而，「當[自由]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時」，身處保守陣營的她便難以再高談自由了。⁷⁶的確，在 1780 年代，不論政治立場如何，文人相對沒有包袱地撰寫廢奴詩歌，參與廢奴活動；

⁷⁴ More, "The Black Slave Trade," 2, line 19-28.

⁷⁵ Hannah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Ma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2nd ed. (London: T. Cadell, 1793).

⁷⁶ Richard Hole, "Hannah More on Literature and Propaganda, 1788-1799," *History* 85:280 (October 2000): 617.

然而，法國大革命爆發後，英國文人開始對比激進的民主共和體制與英國的君主立憲，更細緻地探討自己所支持的自由與權利的本質，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有何差異，與柏克有何異同。到 1793 年初英法宣戰後，支持法國大革命幾乎等同支持英國的敵人，這導致英國廢奴運動幾乎陷入停滯。此時，無論文人或政治人物，都不再敢輕易說出「上帝造人，皆生而獨立自由」這類口號，以免被視為支持法國共和政府或雅各賓陣營。⁷⁷不過，本文強調，儘管外在政治環境的變遷，使得 1790 年代的改革文人陷入政治表達的困境中，莫爾在 1788 年表達的自由觀念與她一生中的主張相比並沒有顯著的改變。即便在晚年重新編輯自己的作品時，她並未避諱收錄〈奴隸制度〉一詩，也未改變其內容。⁷⁸

莫爾的自由概念始終是從基督教教義而來，從宗教上講上帝創人的平等和賦予人的理性和自由；她主張由社會菁英從事福音傳播，教導人民權利和義務觀念(但這種權利義務觀念是從社會整體出發，不同於「人人皆有政治權利」)，所以並未否認人們應當具有獨立和自主性。事實上，在法國大革命剛爆發時，她沒有在第一時間作出批評。當時她聽聞巴黎

⁷⁷ 「雅各賓」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政治團體「雅各賓俱樂部」(Jacobin Club)成員的統稱。在 1792 至 1796 年間，英國中產階級自由派文人和下層激進社團被視為「英國雅各賓」。英國自由派文人賽沃爾(John Thelwall, 1764-1834)曾說明英國雅各賓：一、這是英國保守陣營所給的印記；二、認同法國大革命關於理性和人性的理念；三、「英國雅各賓」意味不滿英國政治現狀，支持政治改革，批判封建階級的規範。John Thelwall, *Rights of Nature, Against the Usurpations of Establishment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People, in Reply to the False Principles of Burke. Part the Second* (London: H. D. Symonds, 1796), 32. 不過，英國保守陣營各式出版品一再將國內的雅各賓描寫成一手捧著潘恩的《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 1791)，一手殺父弑君、盜取他人財產；口中高談理性，行為卻褻瀆上帝。

⁷⁸ More, "The Black Slave Trade," 371-373.

市民攻擊巴士底監獄的消息，雖然不贊同群眾無法無天的行為，她還是期待法國政治可以因此出現積極的進展。⁷⁹然而，巴黎市區暴動頻傳，沒多久之後她就對於法國現狀感到焦慮和擔憂，擔心大革命會將法國從「專制和教權」帶入更可怕的無政府和無神論狀態。⁸⁰

莫爾曾和友人佛朗西斯·柏斯卡溫(Frances Boscawen, 1719-1805)討論不服從英格蘭國教會的新教牧師理查·普萊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的布道文《論愛本國》(*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1789)。⁸¹普萊斯的布道引起柏克不滿，柏克曾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大力抨擊普萊斯的激進政治思想，以及法國大革命與英國激進改革者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觀。《法國大革命的反思》進一步招來英國自由派作家捍衛個人權利或共和主義，形成 1790 年代初的「大革命辯論」。值得注意的是，莫爾一開始曾贊同普萊斯布道文的「愛世界如同愛本國」觀點。普萊斯批評歷史中愛本國容易形成支配他國、對外征服的野心行為，他主張吾人應當追隨法國政治改革腳步，完善英國君主立憲，並且將自由、和平、幸福理想推展到世界各處，形成世界共同體。⁸²莫爾認同基督教「普世慈善」(universal benevolence)的本質是擁抱世上所有群體和國家，而每個個體都可以在基督之愛和慈善中，團結為一體。

身為英國國教會信徒的莫爾和不服從國教會的普萊斯最大不同處在於，莫爾相當強調社會秩序、階級和遵守規範，而這些社會階級

⁷⁹ Hannah More, "H. More to Mr. Walpole," September, 1789,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170.

⁸⁰ More, "H. More to Mr. Walpole," September, 1789,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188-189.

⁸¹ 柏斯卡溫是十八世紀倫敦著名的家宴主持人。

⁸²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London, 1790.

和規範在法國已經被推翻，所以當她繼續分析法國大革命時，她就不能認可法國走向共和體制，基督教道德和責任觀隨之崩解：

然而，我無法想像透過去除所有宗教和道德約束，推翻所有私人或公共領域的臣屬關係，談論慈善愛人並殘酷行事：引用乞丐般的小希臘共和國的法律和原則，至一個廣闊、人口眾多、文明而腐敗的帝國，能達到什麼偉大目的。⁸³

莫爾對於法國大革命中無視傳統階級和宗教倫理的思想感到擔憂，她認為歐洲文明建立在基督教及其價值體系中的自然法、倫理、社會責任和服從之上。小國寡民且貧窮的希臘城邦民主制早已不符合十八世紀的歐洲，不適合治理現代國家，遑論英國已是商業帝國。

（二）懲罰式神意論與社會風俗改革

莫爾在 1790 年代的著作中指出，歐洲文明是基於基督教倫理發展而來，各階級在神聖的自然法之下應服從規範和擔負社會責任。在她看來，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期間，無神論、放縱和無政府等概念在歐洲傳播，這些都是法國散播出來的毒物。因此追隨法國「毒物」和放縱生活方式的英國雅各賓或上層貴族，在某種程度上是背叛了自己的國家。莫爾一向主張，私生活的敗壞會帶來公共的災難，所以她急切地呼籲各界，在維持現有社會結構的前提下，進行「國家風俗和原則的道德革命」（“a moral revolution in the national manners and principles”）。⁸⁴正如琳達·科利指出，莫爾譴責英國上層階級不道德和不虔誠，追隨法國

⁸³ More, “H. More to Mrs. Boscawen,” 1790,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210.

⁸⁴ More, *The Religion of the Fashionable World*, 100-101. 關於莫爾批評上層社會道德敗壞，行為放縱，參考 100-102, 126-128,

菁英文化，行為放縱奢侈，無疑是「文化上背叛」。⁸⁵由此也可見，雖然莫爾身處政治保守陣營，她的政治論述並非戰後左派歷史學家湯普森批評的一味奉承既得利益者，而是具有社會批判性。莫爾也相當積極行動，透過她自己及其福音派友人威伯福斯和麥考利的福音傳播，在家戶間、學校和社團傳播出版品，同時也在書店和零售商販售，嘗試建立以中產階級和基督教價值觀為基礎的新興意識形態。

懲罰性的神意論一直延續至啟蒙時代，十八世紀人們依舊在信仰的世界中，多數人相信國家的命運與人民的道德程度密切相關。根據歷史學者克拉克(J. C. D. Clark)的說法，在十八世紀下半葉，「神意式論述」仍然是英國「對事件進行時的遭遇和反思的主要方式」，此種國家報應的想法甚至延續到十九世紀。⁸⁶尼古拉斯·蓋雅特(Nicholas Guyatt)也強調，在啟蒙時代，無論是倫敦還是愛丁堡的知識菁英，多半將神意式用語，特別是司法神意論和歷史神意論，應用在當代事件和政治中。⁸⁷司法神意論指的是相信上帝會依據國家的道德內涵或行為來懲

⁸⁵ Colley, *Britons*, 188-189.

⁸⁶ J. C. D. Clark, "Providence, Predestination and Progress: or, Did the Enlightenment Fail?" *Albion* 35:4 (Winter 2003): 561, 565.

⁸⁷ 正如蓋亞特所解釋，「司法神意論」意味著「上帝純粹就人民和領導者的德性評斷此國，然後獎賞或懲罰他們，不考慮人類任何宏大計劃」；「歷史神意論」乃是「上帝為某些國家設想了改善世界的特殊角色，並為之量身訂製他們的歷史，準備實現這個使命。」他也寫出第三種神意觀，也就是「啟示神意論」，「相信上帝在當今事件中，真實展現《啟示錄》中的敘述，並將各個國家塑造成這齣戲碼(案：《啟示錄》)中的要角。」就本文而言，第一種司法神意論最常見。蓋亞特認為，啟示神意論在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社會改革運動和廢奴運動中不常見。Nicholas Guyatt, *Providence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57. 不過，根據彼得·瓊斯(Peter M. Jones)最新的論文，他恐怕不會同意此看法。瓊斯指出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歐陸和北美社會都出現彌賽亞式的宗教熱情，將宗教和革命行動結合。P.

罰或獎勵人民；歷史神意論則是相信上帝會在某個階段賦予某個國家或民族特定的使命或角色。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與歐陸商業帝國關係緊張，既有奴隸貿易，也有大量種植園產品和全球貿易競爭，以及商業和消費社會帶來的社會問題，知識菁英因此擔心人民道德墮落，將導致英國衰敗，在國際競爭中被淘汰。對此王室多次頒布文告，鼓勵英國人民培養虔誠和美德。1787年喬治三世發佈了〈鼓勵虔誠和美德宣言；預防和懲罰邪惡、褻瀆和不道德行為〉，呼籲壓制所有「散漫和放縱的印刷品、書籍和出版品」，⁸⁸並懲罰出版商和零售商。此文告內容並非創新，早在瑪莉二世(Mary II, 1689-1702 在位)和安妮女王(Anne, 1702-1714 在位)時期就已發佈過類似內容。王室頒布文告之後，威伯福斯積極爭取貴族和教會的支持和贊助，而後也獲得部分地方官員、慈善推動者、福音派以及其他自發性社團支持，形成「文告社」(the Proclamation Society)，致力落實「文告」中的風俗改進工作。⁸⁹此文告在國會議員和「文告社」支持下陸續公佈了四次，各大報紙皆可見其內容。莫爾在1788年以匿名寫作《關於大人物的風俗對於普遍社會的重要性》時，也呼應了王室文告，強調大力推動基督教教育，提升上層社會道德責

M. Jones, "Revelation, Revolution and Utopia, c. 1770-1820,"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38: 590-591 (February/April 2023): 132-156. <https://doi.org/10.1093/ehr/cead047>.

⁸⁸ "A Proclamatio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Piety and Virtue, and for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 of Vice, Profaneness, and Immorality," in "Public Papers," *The New Annual Register, Or General Repository of History, Politic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87* (London: G.G.J. and J. Robinson, 1788), 62-64. 當時報紙皆有刊登此文告，如 "London," *Times*, June 7, 1787, 2.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S33948871/TTDA?u=fujen&sid=bookmark-TTDA&xid=c23eb2e8>, accessed December 11, 2023.

⁸⁹ 關於 1780 年代風俗改革社團的運作和發展，參考 M. J. D. Roberts, *Making English Morals: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Moral Reform in England 1787-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2-58.

任和中庸節制的生活，⁹⁰並指出「改革必須從大人物著手，否則永遠不會有成效……當富人腐敗時，指望他們去改革窮人，就如同將惡臭之物倒入溪流，然而溪水的源頭已經中毒」。⁹¹

英格蘭國教會一直和英國憲政緊密相連，形成獨特的國家認同。十八世紀下半葉，國教會福音派人士擔心英國社會逐漸奢侈，道德敗壞，因此莫爾和威伯福斯等人推廣宗教教育，建立主日學校以重振社會風俗。他們從各級國教會教士得到大量贊助，例如托馬斯·史考特(Thomas Scott, 1747-1821)和約翰·紐頓。倫敦主教貝爾比·波爾特斯(Beilby Porteus, 1731-1809)雖然從未成為福音教派成員，但也與福音教派合作，強調道德復興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他出生於北美維吉尼亞富裕的蓄奴之家，痛惡奴隸貿易，在 1787 年後成為倫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海外殖民地也屬於他的轄區，是英格蘭國教會首位明確且積極推動廢奴運動的宣傳者，並且積極與福音教派合作。他身為倫敦主教和上議院議員，能夠動員教會和政府資源，且廣及大西洋和印度殖民地。波爾特斯後半生最關注的議題和莫爾相似，一是廢奴，二是拒斥潘恩鼓吹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反基督教言論。波爾特斯希冀重振基督教信仰和道德，以對抗法國大革命帶來的世俗化與社會秩序混亂。他認為，「真正的基督信仰，將產生真正的愛國情操和公共精神」。⁹²

在 1790 年代莫爾一再強調宗教教育和忠誠的重要性，她的愛國情操也展現於此。宗教信仰連結小我與大我，也將個人帶到公共生活

⁹⁰ More,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78-79. 她指出王室文告對於過往社會中以個人力量推動的風俗改革，注入強大執行力。

⁹¹ More,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79.

⁹² Beilby Porteus, "Sermon XI, The Necessity of National Reformation," in *Sermons on Several Subjects*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6), 261.

中，正如她所寫的，她希望人們能都理解「天佑吾王」的含義：「我希望忠誠能成為他們信仰的一部分。」⁹³她認為人民的道德關乎國家的命運，所以改善社會風氣至關重要。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無神論，藐視既有價值與秩序，將法國推入最糟糕的境地：

它正在撕裂人類存在的原則。它正在消滅其動機、安全，和目的。……無神論將成為主導，它得到鼓勵並受到歡迎……基督徒，這不是件小事，這關乎你的生命。讓法國今天選擇她要侍奉的人；但至於我們和我們的家，我們要侍奉主。⁹⁴

這段引文的最後兩句話來自舊約《約書亞記》：

但若你們以侍奉耶和華為不悅，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侍奉的神，是你們所住之地的亞摩利人的神。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⁹⁵

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莫爾憂心基督教信仰的崩解與國家的命運，以及為何莫爾在 1790 年代持續且更急切地撰寫、編輯和宣傳刊物。

(三) 宗教信仰，文明社會與女性主動性

莫爾的政治立場為保守派，她不支持專制體制，而是支持負責任的憲政政府，因其能夠確保人民的「安全」、「舒適」和「和平」。⁹⁶不過，她在著作中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論述，皆是從基督教立論，將革命

⁹³ Hannah More, "H. More to Mrs. Kennicott," 2 August, 1791,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302.

⁹⁴ More, "H. More to The Earl of Orford," April, 1793,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363.

⁹⁵ 此段《聖經》譯文出自中文《和合本聖經》〈約書亞記〉第 24 章第 15 節。

⁹⁶ Hannah More, *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the Mechanics, Journeymen, and Day Labourers*, in *Great Britain*, 3rd ed. (London: F. & C. Rivington, 1793), 23.

描寫為對於基督教道德秩序的威脅。霍勒斯·沃爾波(Horace Walpole, 1717-1797)讀完莫爾的《鄉村政治：寫給英國所有的工人、學徒和日工》(*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the Mechanics, Journeymen, and Day Labourers, in Great Britain*, 1792)後，稱她為「聖漢娜」(Saint Hannah)，也在信中表示出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無政府主義和無神論的震驚，並批評諸多如「蛇一般」的「潘恩們，圖克們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們」(The Paines, The Tooks, the Woolstonecrafts [sic.])，⁹⁷他們的激進政治著作出版和流通有害英國。他希望神佑英國安定而幸福。⁹⁸小說家伯妮同樣擔心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混亂，革命現況使她更認可英國憲法和政治秩序。伯妮尤其欣賞《鄉村政治》中的改革方式：「讓每個人改善一項」(Let everyone mend one)，從小做起，按部就班，而不是追求快速和全盤的革命。雖然伯妮不確定《鄉村政治》的主要作者是何人，但她觀察到此論冊的流通廣而快速，「在倫敦引起了很大的騷動」，並使「國家和家庭都得以安全地改革」。⁹⁹

莫爾在《評杜邦演講》(*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1793)中再次陳述，因為法國大革命推翻了「萬能的主」(*the Lord God [who] omnipotent reigneth*)，導致社會混亂和暴力。¹⁰⁰《評杜邦演講》前言先節錄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1739-1817)演講內容，杜邦以聳動的方式傳達法國政府厲行

⁹⁷ The Tooks 的 Took 是英國激進政治改革人物 John Horne Tooke (1736-1812)，「倫敦通訊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重要成員，積極推動國會改革，朝向更民主的政治體制。

⁹⁸ "The Earl of Orford to H. More," 21 August, 1792,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352. 在《鄉村政治》中，莫爾以潘恩和柏克對話的方式，嘲弄潘恩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與潘恩對於英國政治的不滿。

⁹⁹ Fanny Burney, "Frances Burney to Mrs. Locke," 8 January 1793, in *The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Fanny Burney*, vol. 2, ed. Joyce Heml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¹⁰⁰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3. 斜體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的世俗化理性宗教：「什麼！王位崩塌！權杖折斷！君王逝去！但上帝的祭壇依然存在！」¹⁰¹「**自然和理性**，這些應該是人類的神！」¹⁰²杜邦是法國重農學派(physiocracy)經濟學者，強調理性和自然神論，在舊政權時代他曾向財政大臣內克(Jacques Necker, 1732-1804)提供經濟改革建言；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也曾擔任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主席；進入國民公會時期，他主張建立世俗公學校，推翻天主教教育。杜邦最為 1790 年代英國文人熟知的事件，應該就屬他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曾跨海致信柏克，希望柏克認同並祝賀法國大革命，殊不知引發了柏克撰寫《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批評法國世俗、近乎無神論的啟蒙思想引發革命，並回頭闡述英國憲政要義。¹⁰³

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將支持法國大革命的英國人貶為無神論者、毫無宗教和家國情感的冷血者，預言他們一旦得勢，勢必主導一場法國式的恐怖政治。這類政治論述提供了 1790 年代保王派運動(loyalist movement)想像式、扭曲事實的誇張筆法。而莫爾延續柏克式的語言，專注在宗教和道德議題上，她一方面將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者描述為無神論者，預言英國雅各賓(the British Jacobins)對英國社會產生威脅，更進一步將英國社會走向世俗化的道德問題，都推給了法國大革命和雅各賓主義，指出英國雅各賓高呼自由和平等訴求，是他們想過著放縱淫亂的生活，瓜分有產階級財產的伎倆。因此學者格蘭比(M. O. Grenby)批評道，莫爾這一輩福音教派作家，未必了解雅各賓主義的政治內涵，只是利用反雅各賓的論述，大力推動基督教道德改革。¹⁰⁴

¹⁰¹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xi.

¹⁰²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xii. 粗體字為原作者以斜體所強調。

¹⁰³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ed.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⁰⁴ M. O. Grenby, "The Anti-Jacobin Novel: British Fiction, British Conservatism

莫爾認為，杜邦在法國國民公會的演講中傳達了無神論思想，鼓動群眾，實際上群眾歡呼的是「放蕩狂野」(licentious wildness)，沒有反映出真自由，反而會摧毀了「一切真正的幸福」。¹⁰⁵在莫爾看來，身處法國大革命時代，人們有必要起身捍衛英國憲政和基督教社會：「它(案：法國大革命戰爭)是為了捍衛我們的國王、我們的憲法、我們的宗教、我們的法律，以及我們的自由」。¹⁰⁶透過法國大革命這個大事件，莫爾再次表現出她政治和宗教觀緊密聯繫，而人們應該維護道德秩序，侍奉上帝的觀點：「如果說有哪場戰爭是出於自衛和必要而發動的——如果說，人們可以真正被形容為為宗教和家園而戰，那麼這似乎正是這樣的時刻」；「基督徒們！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是你的生活」。¹⁰⁷莫爾害怕若不採取積極行動，反宗教的思想會隨著法國大革命滲入英國社會，潛移默化瓦解政治和社會秩序。

因此，在法國大革命時代，莫爾主張有必要限縮出版自由，禁止傳播法國思想和褻瀆神的言論。許多激進派和自由派作家批評 1790 年英國國會制定並通過限縮印刷出版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的法條，威脅了英國不成文憲法和歷代重要的法典對於英國人自由和權利的規範。¹⁰⁸莫爾的自由概念不同於激進派文人，她首先強調英國整體政治和社會秩序，認為英國的自由也包括「對法律的冷靜愛好」(a sober love of law)和「對宗教的尊崇」(a sacred regard for religion)。她呼籲英國讀者應當兼具理性和感性，進而理解國家改革計劃既不應急於行事，也不可以

and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History* 83:271 (1998): 455-457.

¹⁰⁵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4.

¹⁰⁶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46.

¹⁰⁷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46, 47.

¹⁰⁸ 關於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政府對於出版自由的限縮，以及英國社會輿論的回應，參考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各派對於出版自由之辯〉，《新史學》，32:6(臺北，2021)，頁 125-194。

被個人的權力慾望主導。¹⁰⁹她對於非法、放縱、未經思考的暴力力量，以及「煽動性或無神論的著作」(seditious or atheistical writings)的擔憂日益加劇。¹¹⁰

我們不能說莫爾改變了她在 1780 年代廢奴運動時候主張的自由概念，因為她本來就沒有主張民主共和和公民皆有政治權利。以社會整體和基督教倫理秩序來看，莫爾的思想在她漫長一生中，倒是具有相當的一致性。莫爾在 1780 年代廢奴貿易運動中所主張的觀念——所有人無論膚色，皆由上帝所創，都擁有發展潛力，都是生而平等而自由。這一觀點同樣適用於她在 1799 年《對於現代女性教育體系的批評》中的論述。她堅持男女同為上帝所造，都擁有神賜的理性和發展潛力。只要給予男女兩性合理的教育，他們都能修身養性，進而改善社會風俗。¹¹¹

相同的論點也出現在莫爾另一篇文章〈白奴貿易〉中。該文章在 1799 年匿名發表於《基督教觀察家》刊物中，並於 1805 年以相同的內容，改題目為〈在倫敦和西敏市制定廢除白人奴隸貿易法案的提示〉(“Hints towards forming a Bill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White Slave Trade, in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匿名刊於《每週娛樂者》(*Weekly Entertainer*)。〈白奴貿易〉首先喚起讀者對於奴隸貿易帶來的壓迫和殘酷的譴責，並向國會中致力廢奴的議員表示敬意。而後莫爾將注意力轉向國內社會風氣，呼籲「廢除國內的奴隸制度」，這涉及「非常熱心的廢奴人士的妻子、女兒、姪女、姨母、表妹、母親和祖母」。¹¹²如果黑奴貿易最主要的問

¹⁰⁹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8-10.

¹¹⁰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20-22.

¹¹¹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204.

¹¹² Hannah More, “The White Slave Trade,”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391-392.

題是「不人道和壞政策」(inhumanity and impolicy)，那麼白人奴隸制度也同樣如此。¹¹³

十八世紀英國商業社會高度發展，引起文人多方討論。部分文人對於奢侈消費和感官娛樂感到焦慮，擔心群眾道德會因此而敗壞。那麼，若英國沒有社會改革，是否將受到上帝的譴責？莫爾也抱持這樣的憂慮，並在閱讀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7)時，四世紀之後羅馬帝國的道德敗壞讓她想到大英帝國的現況。¹¹⁴在莫爾看來，歐洲諸國幫助美國獨立就是上帝對於英國人信仰不夠虔誠的譴責。¹¹⁵1780年代，包括新教的荷蘭在內，許多歐洲國家幫助英屬北美殖民地對抗英國，最終讓其成功獨立。莫爾一直主張，私人之惡即公共之惡，而私人之善有助於公共之善。莫爾的看法，再次說明她思想中每個人的主動性：個人的行為皆可能牽涉到國家和帝國發展。¹¹⁶順帶一提，此論點與曼德維爾(Mandeville, 1670-1733)提出的「個人之惡有助於公共之利」大相逕庭，也大不同於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從人之常情的自我為中心出發的關懷，認為自利才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些對比反映出十八世紀商業社會發展中，文人對於奢華和文雅的不同態度。¹¹⁷

¹¹³ More, "The White Slave Trade," 393.

¹¹⁴ Hannah More, "H. More to her sister," 1782,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1, 236.

¹¹⁵ More, "H. More to her sister," 1783,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1, 286-287.

¹¹⁶ 莫爾主日學校的收益也是在門迪普(Mendip)地區行慈善活動，惠及地方上的窮人家。這也是私人利益，造就公共之善和公共利益。

¹¹⁷ 參考陳正國，〈從利他到自律：哈其森與史密斯經濟思想間的轉折〉，《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0(臺北，2004)，頁5-7, 13-19；陳正國，〈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臺北，2012)，頁791-795, 810-818；陳建元，〈伯

莫爾對於個人道德與國家命運的焦慮，反映出部分懷舊文人對於英國工商業社會快速變化和國勢興衰的深切關懷，這是福音教派社群內外皆可見的現象。道德焦慮加速 1780 年代以降的社會改革，例如以廢奴運動和主日學校的建立，重振人民的信仰與道德。¹¹⁸莫爾同時為一般中下層女性以及王儲夏綠蒂公主撰寫教育書。她主張中上階級女性具備精緻的道德情感，能夠肩負基督教的慈善責任，服務社會，也因此，莫爾形成了具高度德性和女性化的愛國情操論。

莫爾並非為了婦女的政治權利而主張改革；她的出發點依舊是改善社會風俗以及人皆有理性，應該獨立不受奴役；而〈白奴貿易〉一文的寫作目的是讓所有女性擺脫「時尚」的奴役，不再是商業社會下的奴隸。¹¹⁹莫爾認為，虔誠而中庸節制的中產階級婦女是當前社會的道德楷模，故應當在社會風尚改革中發揮影響力。莫爾依照男女各有職責的概念，始終主張女性在道德和信仰上的修養更高，比男性更適合教化社會。這也是為何她在《塑造年輕公主性格的提示》中一再強調，女性統治者的基督教道德使她們能夠成為更好的君主。英國在道德改革和福音運動時期擁有一位女性王儲，乃是得到神佑。莫爾也舉歷史為證，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 在位)相對溫和的宗教改革政策，和她用人唯才的能力，¹²⁰以及瑪莉二世(Mary II, 1689-1694 在位)作為道

納德·曼德維爾論十八世紀文雅文化與國家富強》，《新史學》，34:2(臺北，2023)，頁 20-26。

¹¹⁸ 莫爾與其妹主日學校的營運和教材，參考 Martha More, *Mendip Annals: Or, A Narrative of the Charitable Labours of Hannah and Martha More in Their Neighbourhood*, ed. Arthur Roberts (London: James Nisbet, 1859). 此外，莫爾與威伯福斯長達四十多年的書信往來中，窮人小孩教育的經驗分享和反思一直是重要議題。

¹¹⁹ More, "The White Slave Trade," 392-394.

¹²⁰ More, *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vol. 1, 178.

德楷模和推動國教會發展，皆是最好的君主典範，並能恢復國家傳統的美德和風俗。¹²¹因此，克雷依(E. J. Clery)認為，莫爾賦予女性文人越來越突出的地位，促進更精緻和感性的文化生活。¹²²哈里特·蓋斯特又更大膽地認為，莫爾與其他女性文人引發了英國文化和社會一連串的變化，使她們在此世紀末能夠取得「更接近公民政治中的公共身分」，為日後更激進的沃斯通克拉夫特鋪路，進而談及女性的權利。¹²³這正是蓋斯特將莫爾視為保守女性主義者的原因。不過，筆者依舊主張，莫爾並沒有女性主義的想法，但她的人生事業確實有助於女性在父權社會下不妄自菲薄，進而有更大的社會貢獻。她始終是在既有的社會秩序和等級觀念下，相信所有人不狂妄也不自貶，發揮神賜的天賦，都可以有一番成就，有益於社會。

此外，國教會認為女性本質上是虔誠和純潔的，是善良的照顧者，適合承擔復興國家道德的責任，也確實在這波道德改革中起了作用。教士們強調婦女的虔誠和道德，積極標榜賢淑的婦女成為社會典範，也贊助婦女的著作，支持她們參與慈善事業和學校教學。¹²⁴是以，波爾特斯和莫爾合作，鼓勵莫爾寫作和出版，讓女性在國家道德改革運動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不僅在家庭中背負淨化道德之責，在公共領域亦有重任。

莫爾一方面勸導公眾過著虔誠和愛國的生活，另一方面，她批評啟蒙和法國大革命思想危害了英國傳統中的基督教道德和社會秩序。

¹²¹ More, *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vol. 2, 366-367.

¹²² E. J. Clery, *The Feminization Deb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iterature, Commerce and Luxury*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8-9, 11-12.

¹²³ Guest, *Small Change*, 14.

¹²⁴ Susan Staves, "Church of England Clergy and Women Writers," in *Reconsidering the Bluestockings*, 81-103.

正如她在《評杜邦演講》中寫到，英國擁有自己的憲政傳統、國教會和法律，並且與時俱進，而吾人的「自由」也必須在正確且合理的社會脈絡、不違背英國憲政傳統下才有意義。¹²⁵英國人應當對於法國思想保持警惕：「讓法國今天選擇她要侍奉的人；但至於我們和我們的家，我們要侍奉主」。¹²⁶如前文所述，此段文字在莫爾的私人書信中已經出現過，在《評杜邦演講》中再次出現；莫爾批評法國人拋棄他們的信仰，錯以為放縱就是真正的自由。在該論冊的末尾，莫爾懇求英國每個家庭堅持基督教信仰。她不僅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她將家庭和國家的命運連結：英國家家戶戶將繼續侍奉主，秉持基督教道德倫理，國運將持續昌隆。

五、社交活動與社會影響力

在前面章節所述的基礎上，本文最後討論莫爾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影響。根據出版商約瑟夫·柯特爾(Joseph Cottle, 1770-1853)的回憶錄，莫爾和她的四姊妹(五人皆未婚，在晚年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一起)在巴利伍德農莊的家經常有貴族、牧師、國會議員和文人來拜訪：

在這裡，她們皆受到尊重和愛戴：她們的家是虔誠、愉悅、文學和好客的場所；她們本人有幸獲得主教、貴族和崇高地位的人的拜訪，可能比這個王國中任何私人家庭都來得多。¹²⁷

據知，從 1775 年開始，莫爾定期前往倫敦，參加伊莉莎白·蒙塔

¹²⁵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46.

¹²⁶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47.

¹²⁷ Joseph Cottle, *Reminiscence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nd Robert Southey*, 1847, 78, www.fulltextarchive.com/pdfs/Reminiscences-of-Samuel-Taylor-Coleridge-and.pdf, accessed 22 October 2021.

古(Elizabeth Montagu, 1718-1800)在希爾街(Hill Street)的晚間聚會。聚會中莫爾遇到其他藍襪文人(the bluestockings)，例如伊莉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 1717-1806)、佛朗西斯·柏斯卡溫、伊莉莎白·維希(Elizabeth Vesey, 1715-1791)、佛朗西斯·伯妮，以及賽繆爾·詹森博士(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¹²⁸從莫爾寫給姐妹的信件得知，她透過藍襪文人聚會建立了人際網，和不同社會背景的菁英往來，聚會中不僅討論古典文學與新出版刊物，也關注奢華、道德敗壞、奴隸貿易等社會議題，以及政治事件和國際新聞。

「藍襪」一開始是戲謔之詞，不限性別的指涉中上階層不知打扮的學究，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往往是指出生中上階層，受過良好宗教和古典教育，具國教會信仰，學養豐富的文人。不過當時著名的「藍襪」多半是女性，她們是「女性才智者——令人敬畏的團體」，「被嘲笑她們的人稱為**藍襪俱樂部**」。¹²⁹藍襪文人寫劇本、詩作，也著文鼓吹廢奴運動，推動女子教育，莫爾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藍襪文人彼此認識，既在家中宴請政治或文化上重要人物，也與賓客長年互相通信，談論經典著作，時常以古抒今，也討論政治議題。在十八世紀資料中，通常女性樂於以藍襪作為自我身分，最著名者有蒙塔古夫人、

¹²⁸ 蒙塔古夫人在世時，被尊稱為「藍襪女王」(the “queen of the blues”)；維希也是著名的家宴主持人；卡特是著名的古希臘和拉丁文翻譯家。

¹²⁹ 作家赫斯特·皮奧齊(Hester Thrale Piozzi, 1741-1821)描述到，藍襪社交圈是“the female Wits – a formidable Body, & called by those who ridicule them, the *Blue Stocking Club*”. Hester Lynch Thrale (later Piozzi), *Thraliana: The Diary of Mrs. Hester Lynch Thrale*, vol. 2, ed. Katharine C. Balderst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381, n. 3. 粗體字為原作者以斜體所強調。也參考 Sylvia Harestack Myers, *Bluestocking Circle: Women, Friendship, and the Life of the Mind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Gary Kelly, ed., *Bluestocking Feminism: Writings of the Bluestocking Circle, 1738-1785*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1999).

柏斯卡溫和維希。¹³⁰女性成員在交談中也分享自己和其他藍襪成員信件，朗讀信中文句或詩歌。¹³¹例如，蒙塔古夫人的聚會中，賓客討論當時重要時事，詹森博士談論倫敦新出版的劇本；柏克表達對美國獨立的想法，並批評約書亞·塔克(Josiah Tucker, 1713-1799)對於北美的觀點。¹³²同一時期，莫爾也受邀前去柏斯卡溫的家中聚會，在那裡遇到了蒙塔古夫人、卡特和赫斯特·查邦(Hester Chapone, 1727-1891)等女性，席間討論當時的政治和文學議題，也在聚會期間流通、閱讀他人書信和手稿，這些都展現出十八世紀「私人」書信和「私人」住所的「公共」性質。

莫爾的寫作能力在 1780 年代逐漸受到認可，她的手稿在朋友圈中廣泛流傳。例如詩歌〈藍襪聚會；或，談話〉(“The Bas Bleu; or, Conversation”)一方面記錄了當時倫敦社交聚會的樣貌，此詩很快成為倫敦相當受歡迎的作品，也證明了社交網的訊息傳播力量之大。倫敦社交圈談論莫爾的詩歌，爭相收集莫爾簽名的手稿。¹³³〈藍襪聚會；或，談話〉的內容聚焦在伊莉莎白·維希的家中社交聚會。莫爾也刻意強調英國藍襪文人的聚會不同於歐陸的沙龍聚會：在倫敦的聚會沒有打牌，沒有

¹³⁰ 參考 Nicole Pohl and Betty A. Schellenberg, “Introduction: A Bluestocking Historiography,” and Harriet Guest, “Bluestocking Feminism,” in *Reconsidering the Bluestockings*, ed. Nicole Pohl and Betty A. Schellenberg (San Marino, California: Huntington Library, 2003), 1-20; 59-80.

¹³¹ Hannah More, “Hannah More to one of her sisters,” 1775,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1, 51-52.

¹³² More, “Hannah More to one of her sisters,” 1775, vol. 1, 53-54; “Hannah More to one of her sisters,” 1775, vol. 1, 58, all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¹³³ Hannah More, “Hannah More to her sister,” 1784, vol. 1, 318-319; “Mrs. Boscawen to H. More,” 1784, vol. 1, 322-323; “Walpole to H. More,” 6 May 1784, vol. 1, 335; “Mrs. Vesey to H. More,” May 1784, vol. 1, 336-337. All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迂腐、賣弄知識的男性，也沒有可笑的虛榮女人。¹³⁴在藍襪聚會中，男女文人一起討論文學和交換意見：

但是，這正是你的溝通(案：或譯為商業 commerce)：對話，
必須透過不斷巡迴流動來賦予它用途；
這是人類最崇高的溝通，
其珍貴的商品是心靈！¹³⁵

正如莫爾所指出，聚會中的人們意見交換，形成公共意見，他們往來溝通的是心智，不是趨炎附勢，不是賣弄知識或花枝招展的時尚。莫爾以「商業」、「商品」的雙關含義諷刺商業社會，也巧妙地藉由文人聚會的優點，提出解決商業社會缺失之道。處在十八世紀下半葉，莫爾正經歷英國的工商業快速發展與世俗化時代，不論是城市發展、商業活動、消費性商品、出版業和書店基礎設施，都在加速推動思想與訊息傳播。

莫爾知道新的文化載體在形成和傳播思想上的作用，且能夠高明地使用它們。在不同事件中，她的聲音總能透過不同的出版形式，達到社會影響力。除了出版品外，她也熟知社交活動帶來的人脈。1770年代莫爾便在倫敦社交圈中流傳手稿，與眾人討論時事。1780年代推動廢奴運動時，她透過與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合作，開始參與福音教派運動和廢奴運動。1790年代初莫爾透過小冊子，模仿村民對話形式，淺白地說明潘恩和柏克思想，支持柏克和英國憲政，1790年代後期她則編纂雜誌、撰寫大量雅俗共賞的歌謠，支持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下的英國與英國憲政，並且與威伯福斯及教會人士合作，在布里斯托地區建立主日學校，編教材，致力基督教道德改革與社會風俗重建。

¹³⁴ Hannah More, "The Bas Bleu; or, Conversation,"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70, line 50-51.

¹³⁵ More, "The Bas Bleu," 81, line 294-297.

進入十九世紀，她也撰寫給夏洛特公主的教育書，表達對於女性王儲的支持。綜觀莫爾一生，她的個人事業都與英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緊緊相扣，並總是即時反映時事，快速動員和反應輿論，且清楚知道自己要使用哪些人脈和社會資源。

1790年代的莫爾已經是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皆高的文人。她的匿名論冊《鄉村政治》廣受歡迎，文人朋友不斷地幫她宣傳此書。此書出版後，蒙塔古夫人廣寄《鄉村政治》給她的通信對象。¹³⁶倫敦主教波爾特斯也大力推廣此書，試圖說服莫爾在書上署名，¹³⁷並且向宮廷推薦此書。波爾特斯在上議院中辯論廢奴議題，並於1798年開始在倫敦皮卡德利(Piccadilly)展開公眾講座，提振基督教倫理精神。在社會風俗改革過程中，波爾特斯非常倚賴莫爾簡潔且清晰明瞭的敘事風格，兩人時常書信往來，結合彼此長處，互相合作。波爾特斯享有上議院和英格蘭國教會體系的資源，莫爾的小冊子和主日學教育能夠將道德風俗改革的內容帶入中下層社會。波爾特斯將莫爾推薦給保守政治社團「保護自由與財產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¹³⁸該保王協會是由極為強調社會秩序的保守地方官約翰·理夫斯(John Reeves, 1752-1829)主導，1792年11月20日成立，是十八世紀末最重要的宣傳保守思想的社團。此團體也出版政治論冊，宣傳英國政治體制和柏克的政治思想，以誇張文辭批評英國激進分子對於法國大革命自由和平等理念的支持，即是擁抱無政府、無

¹³⁶ "Mrs. Montagu to H. More," 1792, vol. 2,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344.

¹³⁷ Beilby Porteus, "Bishop of London to H. More," 1795, British Library RP 238/3. 也參考 Beilby Porteus, "To Hannah More," Bristol Archives 26168. 波爾特斯非常欣賞莫爾的詩歌，一而再再而三鼓勵莫爾出版，並將名字一同印出。

¹³⁸ Porteus, "Bishop of London to H. More," 1792,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342-343.

私有財產、無宗教信仰的國度，大力說服民眾接受現有的君主立憲，並以此政治傳統為傲。儘管該協會對外宣稱是市民自組的團體，實際上它得到小彼特政府的支持和贊助。因此，《鄉村政治》在戰鬥力十足的保王協會推波助瀾宣傳下，很快地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品。

莫爾隔年出版的《評杜邦演講》再次引發社交圈和出版界的熱烈討論。地方報紙接連報導「漢娜·莫爾小姐」的新作，她「著名的筆」致力對抗杜邦在 1792 年 12 月於法國「國民公會中的無神論演講」(Atheistical Speech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¹³⁹莫爾作品的渲染力和影響力在她編撰的《廉價知識文集》更為顯著。學者蘇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指出，莫爾研究了窮人的讀物，也注意到英格蘭當時有兩萬多名「小販」(hawkers)在販售「粗俗、淫穢的讀物」，以及「褻瀆和不雅的歌曲和廉價報紙」，¹⁴⁰深感她要對抗的不只是英國雅各賓，更嚴峻的是大量低俗不堪的廉價讀物敗壞英國社會風俗，因此急需推動社會風俗大改革。莫爾借鑑低廉讀物的寫作風格和特色，以歌謠或簡單故事的形式寫下大量短篇，例如歌謠形式的〈起事〉(“The Riot”)，短篇形式的〈方藤先生之死〉(“The Death of Mr. Fantom”)。¹⁴¹這些作品批評群眾騷動，抨擊人民酗酒、懶散、迷信等問題，或者描寫孤苦出身的男女主角如何在人

¹³⁹ *Bath Chronicle and Weekly Gazette*, 28 March, 1793. 也可以參考 *Bath Chronicle and Weekly Gazette*, 8 August, 1793; *Sheffield Register*, 23 August, 1793.

¹⁴⁰ Hannah More, “Plan for Establishing a Repository of Cheap Publications...,” 轉引自 Susan Pedersen, “Hannah More Meets Simple Simon: Tracts, Chapbook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 1 (1986), 87.

¹⁴¹ Hannah More, “The Riots,”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vol. 1 (Boston: S.G. Goodrich, 1827), 50-51; More, “The Death of Mr. Fantom,”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vol. 1, 123-132.

生試煉中分化，有些墮落至賭博、沈迷酒精的深淵，有些則不畏艱辛，勤奮工作，最終迎來相對安穩的人生。又如在〈兩個富農〉(“The Two Wealthy Farmers”)中，莫爾透過簡單易懂的故事，傳達家庭教育對於個人道德與宗教信仰養成的重要性。故事中，虔誠的沃西先生(Mr. Worthy)重視理智和原則，對青年深入了解後才允許婚事。而威爾遜先生(Mr. Wilson)在與沃西先生家庭的接觸過程中，目睹這個家庭宗教知識和實踐不斷進步，沃西先生成為值得效法的楷模。¹⁴²相比之下，驕傲虛榮的布雷格維爾先生(Mr. Bragwell)家庭僅有表面的基督信仰，但最終他懊悔地承認，家庭教育應當「培養他(案：孩子)對上帝的敬畏，約束自己的慾望，教導他明白不信和驕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¹⁴³莫爾始終強調家庭環境、宗教信仰和自我約束的道德觀，而這些道德觀念都體現在她的故事中。她透過淺顯通俗的語言和故事表達了複雜的道德和社會改革理念，讓普羅大眾更易於接受並反思自身的行為和價值觀。

小冊子或小報的廣泛流傳，展現出知識時代同時也是印刷品盛行的時代，而對莫爾來說，這更是充滿誘惑和機運的時代。於是乎，《廉價知識文集》的出版和流傳也以小報書寫的形式，讓宗教和道德教育進入市場。¹⁴⁴1793年起，莫爾以匿名方式，編輯和撰寫《廉價知識文集》。這些論冊集在倫敦和英格蘭西南部社交圈中傳閱，得到好評，部分詩歌改編成歌謠集。莫爾寫信給柏斯卡溫夫人，寫到這些小冊和

¹⁴² Hannah More, “The Two Wealthy Farmers,”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vol. 1, 156.

¹⁴³ More, “The Two Wealthy Farmers,” 167.

¹⁴⁴ 斯特本勞赫指出，英美學界很熟悉十九世紀福音教派社團如「基督教知識促進會」(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和「聖教書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等社團，結合商業機制，在社會改革上有重要成果，以及建立起中產階級的道德觀，那麼吾人更不能忽略作為十九世紀福音運動與風俗改革先驅的《廉價知識文集》。Stubenrauch, *The Evangelical Age*, 106.

歌謠集得到很好的迴響：

在編輯《廉價知識文集》的繁重工作中，它(文集)得到許多優秀人士的積極保護，讓我結識許多住在遙遠地方的聰明善良的人士。他們急切地尋找任何微小渺茫的嘗試機會，企圖制止猖獗的罪惡潮流，以及正在威脅我們的放縱和叛亂精神。¹⁴⁵

《廉價知識文集》試圖讓地方居民了解法國大革命和法國的實際狀況，提醒人民警惕法國大革命言論，尤其是關於褻瀆宗教，無視社會責任和倫理，造成無法無天、動輒造反的社會現狀。波爾特斯主教給莫爾的信中表示，他建立了一些管道，讓小販能夠在地方上販賣小冊子讀物。波爾特斯相信小冊子中的歌謠將成為家家戶戶的話題，產生穩定政治和社會的作用。此外，波爾特斯也將這些讀物送給坎特伯里大主教，大主教也願意支持並贊助莫爾持續出版。¹⁴⁶

時至 1795 年，各界友人都敦促莫爾將《廉價知識文集》正式發行，此時資金、訂閱單和銷售渠道都已經準備就緒。波爾特斯主教和出版商湯瑪斯·卡戴爾(Thomas Cadell, 1773-1836)討論出版計劃，卡戴爾表示熱烈支持。波爾特斯於是鼓勵莫爾：

你起初非常謙遜和謹慎，首先在鄰里的範圍進行你的大膽(出版論冊)嘗試。但是你看，你就像真正的女性冒險家，馬上就毫不畏懼地踏入廣闊的世界，若沒有征服英國所有低俗的惡習就不罷休。¹⁴⁷

¹⁴⁵ More, "H. More to Mrs. Boscawen," November 1793,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383-384.

¹⁴⁶ More, "Hannah More to her sister," 1795,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432.

¹⁴⁷ "Bishop Porteus to H. More," 1795,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456.

這段話清楚展現了莫爾在面對父權社會和贊助者時的靈活應對，以及她試圖透過這些人脈實現的弘大目標。同時，透過這段側寫，我們得以窺見莫爾在人生事業上取得成功的關鍵。作為「真正的女冒險家」，莫爾不僅鼓勵女性讀者投身「公共利益」，¹⁴⁸更提倡以溫和的方式付諸行動，實踐愛國情操，推廣節制的基督教道德，並肩負起社會責任感。不久之後，《廉價知識文集》正式得到官方的贊助和推廣。

1795年3月3日，好幾家報紙都做了同樣的報導：

昨天在奇普街的哈薩德先生圖書館出現了有趣的場景。這一天被指定為廉價道德和宗教文集的出版日，這些文集打算由兜售者廣為傳播……一些穿著得體的兜售者從全國各地前來，每人都從在場的女士和男士訂閱者那裡，得到一系列教育和娛樂性質的詩歌和散文集。¹⁴⁹

最後，該報導作者對於莫爾以「不懈不倦的熱情和能力」(indefatigable zeal and abilities)策劃和執行一系列「慈善計畫」(benevolent plan)，表示高度讚譽。¹⁵⁰其他地方報，如《巴斯報》(*Bath Chronicle*)、《德比報》(*Derby Mercury*)和《曼徹斯特報》(*Manchester Mercury*)報導了《廉價知識文集》在其他城市的銷售狀況，連著好一段時間這些報刊都會寫到《廉價知識文集》製作成不同版本的詩歌集並出版，或是以小書形式抽印再版，這樣的現象延續到十九世紀初。¹⁵¹

莫爾在傳播自己的作品上有一套想法；她仔細考慮了傳閱文集的形式，思考能夠產生廣而深的影響力的推廣方式：「我們文集的流通

¹⁴⁸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14.

¹⁴⁹ *Norfolk Chronicle*, 14 March, 1795; *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 7 Mar, 1795.

¹⁵⁰ *Norfolk Chronicle*, 14 March, 1795; *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 7 Mar, 1795.

¹⁵¹ *The Manchester Mercury and Harrop's General Advertiser*, 19 January, 1796; *Derby Mercury*, 11 January, 1798; *Bath Chronicle and Weekly Gazette*, 30 May, 1799.

方式上，出售優於捐贈，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慈善單位捐贈的書籍很少被閱讀。」她也思考如何讓「佣人、工人、慈善學校和窮人」，以及「醫院、濟貧院、監獄、船上和軍中」皆能閱讀到文集。¹⁵²1790年代最後幾年，報紙中時常刊載文集的短篇故事或歌謠，傳播道德教訓。¹⁵³由於莫爾的保守文集宣傳十分成功，她得到「保護財產與自由協會」的認可，而「風俗改進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也對於莫爾在復興基督教道德上的貢獻表示感激。¹⁵⁴首相彼特亦欣賞莫爾的小冊形式的文集。¹⁵⁵

據波爾特斯主教所言，莫爾的文集也收到西印度群島和美國的訂單。¹⁵⁶莫爾在1797年9月給扎卡里·麥考利的信中提到，她收到來自費城的威廉·柯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的大量訂單。柯貝特是此時期在英國知名的新聞報導者，他雖然支持啟蒙時代的自由、不受壓迫等思想，卻又以英式復古懷舊的方式談人的權利，以及保守的改革方式。柯貝特擔心北美社會道德敗壞，美國「各俱樂部、社會和機構」都沒有提供任何道德指導。¹⁵⁷因此，柯貝特對於莫爾的文集在費城銷售一空非常感激，他還提到莫爾的女性教育書在美國聲望也很高，他

¹⁵² *The Manchester Mercury and Harrop's General Advertiser*, 17 March, 1795.

¹⁵³ 例如 *The Manchester Mercury and Harrop's General Advertiser*, 5 Apr, 1798.

¹⁵⁴ More, "H. More to her sister," 1795,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429. 風俗改進協會成立於1691年，活躍至1730年代逐漸沉寂，至十八世紀中葉短暫復甦。

¹⁵⁵ More, "H. More to her sister Martha," 1796,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2, 475.

¹⁵⁶ "Bishop Porteus to H. More," January 16, 1797, in Mor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vol. 3, 5.

¹⁵⁷ Hannah More, "More to Macaulay," 8 Sept, 1797, in Hannah More, *Letters of Hannah More to Zachary Macaulay, Esq.*, ed. Arthur Robert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1860), 16.

已經要求出版社再刷新一版。¹⁵⁸

莫爾在 1817 年回憶道，在 1790 年代時，一位在英國流亡的法國貴族曾告訴她「便士小報毀了法國」(“Penny papers destroyed France”)，這段話激勵了她開始持續撰寫文集和小書，宣傳基督教道德觀和社會各階級的責任感，確保英國免受法國大革命「毒物的侵害」。儘管當時已經有大量的衛道或福音小冊子出版，莫爾對於自己作品的獨特性相當有自信。她寫道：「為窮人寫作的人會陷入這種錯誤——他們(作家)認為他們(窮人)是愚蠢的。其實他們(窮人)只是無知」。¹⁵⁹莫爾有這樣的領悟，所以她在寫作時竭力避免以壓迫者、頤指氣使、不具理性的態度敘述。

她也知道，雖然個人的力量可能不足成為對抗法國「毒物」的解方，不過「那些手腕更有力量的人可以。我想讓一些**一流人物**投入工作」。¹⁶⁰莫爾在實踐社會改革和普及教育上是積極且變通的，並喜歡與有手腕的人合作。她清楚哪樣的文字風格能夠被中下階層接受，以及如何利用商業機制和社團來擴大社交網路，銷售其作品，並傳播思想。歷史學家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曾言，「這段時期的公共領域逐漸殖民和侵略私領域」，¹⁶¹藉由「讓私領域逐漸具備公共性」的說詞，私領域逐漸被政府或商業機制殖民和侵略。動詞「殖民」和「侵略」

¹⁵⁸ “Cobbett to More,” footnote of *Letters of Hannah More to Zachary Macaulay*, 17.

¹⁵⁹ More, “More to Macaulay,” 24 March, 1817, in More, *Letters of Hannah More to Zachary Macaulay*, 93-94.

¹⁶⁰ More, “More to Macaulay,” 24 March, 1817, in More, *Letters of Hannah More to Zachary Macaulay*, 93.正文粗體字為原作者以斜體所強調。

¹⁶¹ John Brewer, “This, That and the Other: Public, Social and Privat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Shifting the Boundaries: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Dairo Castiglione and Lesley Sharpe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5), 18.

反映出布魯爾對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公私領域權力關係的觀察，意即公共領域具有主動性和侵略性。然而，莫爾的社會活動並未顯示這種單向的權力關係；她的情況更像是雙向的自願合作——她與各社團和政府，個人與公共領域的相互協助。而且，如她對於女性和園丁的解釋，家的角色可以延伸到公共領域，而這個過程不是霸權式、專制父權的「殖民」。

莫爾至晚年都保持著對於社會和教育改革的熱情。她始終支持窮人教育，甚至讚賞輝格黨人鼓吹下層階級教育的政策，並持續參與廢奴運動。1820年代，越來越多女性自組女性社團，發起請願活動，拒絕買糖，推動廢奴活動。威伯福斯則反對女性自組廢奴協會：「讓女性聚會，出版，挨家挨戶發起請願——這些對我而言，不符合《聖經》所描述的女性特質。」¹⁶²他與麥考利在此議題上對話和辯論，威伯福斯始終認為，女性不適宜參與政治活動，應當減少純粹的女性社團，以及她們對公義或人道相關活動的介入。他們兩人在這方面意見有出入，威伯福斯的想法得到另一位克拉朋成員巴賓頓(Thomas Babington, 1758-1837)支持。威伯福斯在信中繼續和麥考利說明：「我主要是出於對這類活動(案：請願活動)的政治性質反感」。¹⁶³莫爾的立場應該是與麥考利相近。當時八十二歲高齡的莫爾持續參與布里斯托地方上的女性廢奴社團(the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 for Clifton, Bristol)，同時她也是「非洲協會」(前身即為「廢除奴隸貿易協會」)的成員，持續為貧窮黑人幼童的教育

¹⁶²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Th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vol. 5, 264.

¹⁶³ William Wilberforce, "Wilberforce to Macaulay," 8 February, 1826, in William Wilberforce,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vol.2, 494. 幾個月後，威伯福斯還會就同樣的議題再次嘗試說服麥考利，"Wilberforce to Macaulay," 27 July, 1826, in William Wilberforce,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vol. 2, 501.

操心，並將寫作的稿費投入慈善事業。¹⁶⁴因此，莫爾展現了「英國愛國者的公共精神」，¹⁶⁵她幾乎不談性別議題，不參與政治活動，不過，她透過實際行動深化女性角色的影響力，並支持女性參與公共生活，在此過程中莫爾實踐了社會改革。

六、結語

本文既不將莫爾視為打壓女子的既得利益者，也非提倡溫和保守的女性主義——根本上她不關心個人(individual)自由與權利，她注重的是整體社會的穩定和進步，而整體社會中也包含了女性和下層人民，這也就說明為何她致力女性教育和廢奴運動。再者，莫爾的高成就反映出英國商業社會有利於行動派女性展現自我，所以莫爾憑著個人的文采與社交能力，累積文化與社會資本，在男女尚未平權的時代，她也做出一番事業。莫爾見證了新的、逐漸不看性別、階級、背景就能夠出人頭地的文人社會——即使她自己對於爭取平等和自由沒有興趣。也正是十八世紀末莫爾一代的文人將洛克教育理念應用在女性教育上，女性和男性一樣是社會中的活躍成員，都具備未來可完美性，這使得十九世紀英國社會逐漸能想像或預期女性爭取和行使公民權利。

漢娜·莫爾強調女性在道德改革上扮演的角色之於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性。在十八世紀商業社會，公眾日益接受「私人之惡，有助於公共之善」的觀點時，莫爾抱持相反的觀點，堅持只有個人為善、虔誠信仰，整體社會才會進步；唯有通過風俗和道德改革，英國方能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讓國家更繁榮。因此，莫爾及其姊妹推動主日教育，

¹⁶⁴ More, "More to Macaulay," May, 1827, *Letters of Hannah More to Zachary Macaulay*, 202-203.

¹⁶⁵ More, *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vol. 2, 19.

寫作與傳播對法國大革命自由和平等觀的反對意見，並宣傳英國國教會與良好道德，以及從事慈善事業。這些作為都顯示出莫爾對於私人之善和公共之善之間，以及私人道德與國家命運之間因果相聯的信念。本文以莫爾為例指出，雖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女性無法擔任公職，但這不意味她們沒有公共影響力。像莫爾這樣的保守女性，通過建立社會資本，包括參與聚會、書信往來，並獲得政府官員與教會高層的支持，使她能夠靈活地穿梭於公私領域之間，發揮顯著的社會影響力。

十八世紀中葉以降約翰·米勒(John Millar, 1735-1801)等蘇格蘭思想家將婦女的處境視為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¹⁶⁶其論述指出，部落社會和亞洲專制帝國將女性視為家中奴隸或財產，這是野蠻的表現，而英國等文明國家則善待女性，將女性視為男性的夥伴。雖然此論述的焦點是政治經濟發展的狀況，並非強調婦女對於社會的貢獻，然而正是具備此條件的十八世紀英國社會，讓莫爾透過其著作和宣傳形成高影響力。她雖然批評商業社會的奢侈與世俗化，並對於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各種政治文宣快速傳播感到極度焦慮，但事實上她對於各種印刷出版品的特色、出版時間、以及大眾語言的掌握都極為到位。莫爾的任何一項成功之道，都與十八世紀啟蒙和商業社會脫不了關係。

儘管莫爾不談論個人權利，也沒有爭取女性的政治或公民權利，但本文已說明莫爾也無意貶低女性在現代文明革新中所扮演的角色。她所做的就是堅持在基督教社會中，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皆有理性，除了必須服從既有神聖秩序外，也須提升自我道德，服務社會。她在書信中呈現的自我樣貌是持家者與園丁，樂於在家中生產書稿和園藝植物。家領域保護了她，而家中角色給予她很高的行動和公共影響力。在 1819 年，年逾古稀的莫爾寫信給朋友：「我一直在忙著推出我的

¹⁶⁶ O'Brien,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 68-109.

作品，新全集 18 卷。」¹⁶⁷在 1824 年聖誕節，莫爾給威伯福斯的信中寫到長期累積下來的職業病——手部肌腱發炎，阻礙她寫作。然而她忍不住在信中又和威伯福斯討論起國家與宗教。¹⁶⁸這就是漢娜·莫爾，忠於基督教信仰，一生服務英國社會。她一生不閱讀沃斯通克拉夫特著作，不討論女性權利，不過，她鼓勵女性在公共領域中善盡道德責任，倒是為後來女權發展的時代奠定一些基礎。因此，對於女性在英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巨變中的知識和思想傳播、工商業社會發展和法國大革命時代政治社會中的角色，莫爾作為一位致力於社會改革的文人提供我們另一種理解這些議題的途徑，也看到莫爾成功結合了宗教信仰、啟蒙思想和強大行動力，曾經為英國社會改革做出何等的貢獻。

(本文於 2023 年 12 月 25 日收稿；2024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以傳統突破傳統：英國文人漢娜·莫爾對於女性內在與社會成就的詮釋與實踐」(計畫編號：111-2410-H-030-068)之部分研究成果，研究執行期間蒙國科會經費支持，謹此致謝。在構思與撰寫論文期間，我有幸與多位師友反覆交流與討論，獲益匪淺，在此深表感謝；也感謝輔大歷史所研究生王宣喬於本文完稿階段的校稿協助。最後，謹向《新史學》匿名審查人表達誠摯謝意，其精闢的批評與寶貴建議對本文的修訂與完善貢獻良多。

¹⁶⁷ Hannah More, "H. More to Miss Buchanan," 11 February, 1819, Bristol Archives 12252.

¹⁶⁸ Hannah More, "More to Wilberforce," 25 December, 1824,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vol. 2, 489.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 莫爾著作

- More, Hannah. "Hannah More Papers." ADD MS 42511. London: British Library.
- More, Hannah. "H. More to Miss Buchaunou." 12252. Bristol: Bristol Archives.
- More, Hannah. *Slavery, a Poem*. London: T. Cadell, 1788.
- More, Hannah.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ners of the Great to General Society*.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6, 1-89.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 More, Hannah. *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the Mechanics, Journeymen, and Day Labourers*. In *Great Britain*. 3rd ed. London: F. & C. Rivington, 1793.
- More, Hannah.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Ma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2nd ed. London: T. Cadell, 1793.
- More, Hannah. *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 2 vols. 2nd ed.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5.
- More, Hannah. "The Bas Bleu; or, Conversation."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65-88.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 More, Hannah. "Sensibility."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167-187.
- More, Hannah. "The Black Slave Trade (Original Title: "Slavery: A Poem)."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371-391.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 More, Hannah.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2 vols. 9th ed.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9.
- More, Hannah. "The White Slave Trade."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1: *Poems*, 391-392.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 More, Hannah. *Estimate of the Religion of the Fashionable World*.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6, 91-267.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18.
- More, Hannah. "The Riots."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 Vol. 1, 50-51. Boston: S. G. Goodrich, 1827.
- More, Hannah. "The Death of Mr. Fantom."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Vol. 1, 123-132. Boston: S. G. Goodrich, 1827.
- More, Hannah. "The Two Wealthy Farmers." In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with a New Sketch of Her Life*. Vol. 1, 132-167. Boston: S. G. Goodrich, 1827.
- More, Hannah.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rs. Hannah More*, edited by William Roberts. 3 vols. 2nd ed. London: Thames Ditton, 1839.
- More, Hannah.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Vol. 3: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 More, Hannah. *Letters of Hannah More to Zachary Macaulay, Esq.*, edited by Arthur Robert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1860.

(二) 其他史料

- "A Proclamatio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Piety and Virtue, and for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 of Vice, Profaneness, and Immorality." In "Public Papers." *The New Annual Register, Or General Repository of History, Politic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87*, 62-64. London: G.G.J. and J. Robinson, 1788.
- Bath Chronicle and Weekly Gazette*, Bath.
- Berry, Mary. *Extracts of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Year 1783 to 1852*, 3 vols, edited by Theresa Lewis. London: Longmans, 1865.
-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urney, Fanny. *The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Fanny Burney*, 12 vols, edited by Joyce Heml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1984.
- Cottle, Joseph. *Reminiscence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nd Robert Southey*. 1847. www.fulltextarchive.com/pdfs/Reminiscences-of-Samuel-Taylor-Coleridge-and.pdf. Accessed 22 October 2021.
- Derby Mercury*, Derby.
- 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 Bristol.
- Fordyce, James. *Sermons to Young Women*. 5th ed. London: D. Payne, 1770.

- Gisborne, Thomas. *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 London: T. Cadell, 1797.
- Gregory, John. *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774.
- Locke, John. *An Epitome of Locke's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C. and J. Rivington, 1823.
- Locke, John.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Boston: Gray & Bowen, 1830.
- Locke, John. *The Education Writing of John Locke*, edited by James T. Axt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ore, Martha. *Mendip Annals: Or, A Narrative of the Charitable Labours of Hannah and Martha More in Their Neighbourhood*, edited by Arthur Roberts. London: James Nisbet, 1859.
- Norfolk Chronicle*, Norfolk.
- Paine, Thomas.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orteus, Beilby. "Bishop of London to H. More." RP 238/3. British Library.
- Porteus, Beilby. "Sermon XI, The Necessity of National Reformation." In *Sermons on Several Subjects* (1806), 247-267.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6.
- Porteus, Beilby. "To Hannah More." 26168. Bristol: Bristol Archives.
- Price, Richard.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London, 1790.
- Sheffield Register*, Sheffield.
- The Manchester Mercury and Harrop's General Advertiser*, Manchester.
- The Times*, London.
- Thelwall, John. *Rights of Nature, Against the Usurpations of Establishment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People, in Reply to the False Principles of Burke. Part the Second*. London: H. D. Symonds, 1796.
- Thrale (later Piozzi), Hester Lynch. *Thraliana: The Diary of Mrs. Hester Lynch Thrale*. 2 vols, edited by Katharine C. Balderst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 Walpole, Horace. *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Fourth Earl of Orford*. Vol. 15, edited by Paget Toynbe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3.
- Wilberforce, Robert Isaac and Samuel Wilberforc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5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38.
- Wilberforce, William.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 Christians*. 14th ed.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20.
- Wilberforce, William.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Vol. 2. London: John Murray, 1840.
-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1792), edited by Deidre Shauna Lynch.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二、近人論著

- 陳正國，〈從利他到自律：哈其森與史密斯經濟思想間的轉折〉，《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0(臺北，2004)，頁 1-31。
- 陳正國，〈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臺北，2012)，頁 779-835。
- 陳建元，〈伯納德·曼德維爾論十八世紀文雅文化與國家富強〉，《新史學》，34:2(臺北，2023)，頁 1-49。
- 汪采燁，〈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反思——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思想研究〉，《新史學》，28:2(臺北，2017)，頁 125-186。
- 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各派對於出版自由之辯〉，《新史學》，32:6(臺北，2021)，頁 125-194。
- Atkins, Gareth. *Converting Britain: Evangelicals and British Public Life, 1770-1840*. Woodbridge-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2019.
- Bebbington, David.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Berg, Maxine.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rewer, John. "This, That and the Other: Public, Social and Privat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hifting the Boundaries: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Dairo Castiglione and Lesley Sharpe, 1-21.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5.
- Bridgen, Adam. "Defending 'Reason's rein': Rationalism as Persuasive Strategy in Hannah More's *Slavery: A Poem* (1788)." In *Hannah More in Context*, edited by Kerri

- Andrews and Sue Edney, 50-67.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092971>.
- Clark, J. C. D. "Providence, Predestination and Progress: or, Did the Enlightenment Fail?" *Albion* 35:4 (2003): 559-589.
- Clery, E. J. *The Feminization Deb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iterature, Commerce and Luxury*.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Colley, Linda.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De Vries, Ja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Ferguson, Moira. "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an Emerging Abolitionist Discours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3:1 (1992): 3-23.
- Gleadle, Kathryn. "'Opinions Deliver'd in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Politics, and Gender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edited by Jose Harris, 61-7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renby, M. O. "The Anti-Jacobin Novel: British Fiction, British Conservatism and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History* 83:271 (1998): 445-471.
- Guest, Harriet. "Bluestocking Feminism." In *Reconsidering the Bluestocking*, edited by Nicole Pohl and Betty A. Schellenberg, 59-80. San Marino, California: Huntington Library, 2003.
- Guest, Harriet. "Hannah More and Conservative Feminism." In *British Women's Writing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Authorship, Politics and History*, edited by Jennie Batchelor and Cora Kaplan, 158-170. New Yor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Guest, Harriet. *Small Change: Women, Learning, Patriotism, 1750-181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Guyatt, Nicholas. *Providence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lated by T. Burg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 Harris, Jose. "From Richard Hooker to Harold Laski: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Late Sixteenth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Civil*

-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edited by Jose Harris, 13-3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arris, Jose. "Introductio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Paradigm or Peculiarity?"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edited by Jose Harris, 1-1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ole, Robert. "Hannah More on Literature and Propaganda, 1788-1799." *History* 85:280 (2000): 613-633.
- Jones, P M. "Revelation, Revolution and Utopia, c. 1770-1820."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38: 590-591 (February/April 2023):132-156. <https://doi.org/10.1093/ehr/ccad047>.
- Kelly, Gary, ed. *Bluestocking Feminism: Writings of the Bluestocking Circle, 1738-1785*. 6 vols.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9.
- Klein, Lawrence E. "Gender and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Questions about Evidence and Analytic Procedu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1(1995): 97-109.
- Kowaleski-Wallace, Elizabeth. "Milton's Daughters: The Educ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Women Writers," *Feminist Studies* 12: 2 (Summer 1986): 275-293.
- Langford, Paul.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9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Mellor, Anne K. "Review: Feminist Debates in the 1790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3:4(2004): 519-524.
- Mellor, Anne K.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the Women Writers of Wollstonecraft's Da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y Wollstonecraft*, edited by Claudia L. Johnson, 141-1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ellor, Anne K. *Mothers of the Nation: Women's Political Writing in England, 1780-183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idgley, Clare. *Women Against Slavery: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1870*.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Myer, Mitzi. "Reform or Ruin: 'A Revolution in Female Manners'." In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edited by Deidre Shauna Lynch, 319-335.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 Myers, Sylvia Harcstack. *Bluestocking Circle: Women, Friendship, and the Life of the Mind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 O'Brien, Karen.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Page, Judith W. "Reforming Honeysuckles: Hannah More's '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 an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Gardens." *Keats-Shelley Journal* 55 (January 2006): 111-136.
- Pedersen, Susan. "Hannah More Meets Simple Simon: Tracts, Chapbook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1 (1986): 84-113.
- Pohl, Nicole and Schellenberg, Betty A. "Introduction: A Bluestocking Historiography." In *Reconsidering the Bluestocking*, edited by Nicole Pohl and Betty A. Schellenberg, 1-20. San Marino, California: Huntington Library, 2003.
- Porter, Roy. *Enlightenmen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2001.
- Richardson, Alan.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Romanticism: Reading as Social Practice, 1780-18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Roberts, M. J. D. *Making English Morals: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Moral Reform in England 1787-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inanan, Kerry. "Too Good to be True? Hannah More, Authenticity, Sincerity and Evangelical Abolitionism." In *Romanticism,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edited by Tim Milnes and Kerry Sinanan, 137-16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St. Clair, William.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taves, Susan. "Church of England Clergy and Women Writers." In *Reconsidering the Bluestocking*, edited by Nicole Pohl and Betty A. Schellenberg, 81-103. San Marino, California: Huntington Library, 2003.
- Stott, Anne. "Evangelicalism and Enlightenment." In *Educating the Child in Enlightenment Britain*, edited by Mary Hilton and Jill Shefrin, 41-55. Aldershot: Ashgate, 2009.
- Stott, Anne. "Patriotism and Providence: The Politics of Hannah More." In *Women in British Politics, 1760-1880: The Power of the Petticoat*, edited by Kathryn Gleadle and Sarah Richardson, 39-55.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 Stott, Anne. *Hannah More: The First Victor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tubenrauch, Joseph. *The Evangelical Age of Ingenuity in Industrial Britain*. Oxford,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utherland, Kathryn. "Hannah More's Counter-Revolutionary Feminism," In *Revolution in Writing: British Literary Respons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Kelvin Everest, 27-63.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Vickery, Amanda. "Golden Age to Separate Sphere? A Review of the Categories and Chronology of English Women's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6:2 (1993): 383-414.
- Vickery, Amanda. *The Gentleman's Daughter: Women's Lives in Georgia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reserve and Progress: Hannah More's Career and 18th- Century British Society

Tsai-yeh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annah More (1745–1833) was a prominent British educator, evangelical social reformer, and advocate of conservative thought during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While she upheld conservative views on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cial hierarchies, emphasiz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order, More actively engaged in social reform with notable success. Her ideas reveal a series of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she rejected John Locke's theory of the social contract but embraced his views on reason and education. Similarly, although she supported established political and patriarchal structures, she also emphasized women's social roles and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ed Christian ideals of charity. These complexities reflect the broader transformations and conflicts of her time, as Britain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upheaval in religion, politics, culture, and economics, alongside an unprecedented acceleration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as.

This paper situates More within this turbulent historical context to explore her objectiv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reform. It shifts the focus away from how she reinforced traditional norms, instead highlighting how she strategically utilized cultural and social networks to provide women with greater agency while maintaining conservative ideals. It examines how her

evangelical faith and Church of England principles shaped her efforts to improve society and moral order. Paradoxically, while critical of commercial society, she relied on its networks to disseminate her ideas and promote reform.

The first section outlines More's views on women's education and social roles, emphasizing that she was not merely a defender of autocracy or patriarchy despite her conservative stance. The second section examines More's engagement with Britain's late 18th-century moral reform movement, illustrating how she translated Christian ideas, such as liberty and anti-slavery, into practical reforms, including moral education. The final section analyzes her strategic use of social networks, such as literary salons and book distribution, to promote reform ideas while adhering to existing structure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although More opposed both commercia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she leveraged the dynamic nature of these systems to achieve her reformist goals. Her efforts made an enduring contribution to British society.

Keywords: Hannah More, evangelicalism, social reform, public sphere, pamphlets, moral reconstruction